总第43期
2017年01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
——四川最早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

宋宝瑞同志对20世纪80、90年代
四川改革开放历程的回顾与思考（上）

英雄不容诋毁 历史不容戏谑
——黄继光英雄形象不容置疑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

1月16~20日，四川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四川省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17年计划的决议、关于四川省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等事项。

大会执行主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省长尹力代表省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范锐平、陈光志、张东升、黄彦蓉、彭渝、刘道平、曾省权、李向志、刘作明、焦伟侠等出席会议。

会议选举黄新初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马华等12名同志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1月14~18日，四川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保持战略定力、携手砥砺奋进，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而不懈奋斗》的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柯尊平主持并讲话。李登菊代表省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和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决议。会议补选崔保华、刘捷、邓川为省政协副主席，补选马小彬等15位委员为省政协常委。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从省情出发，确立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主题，鲜明提出到2020年实现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勾画了治蜀兴川的宏伟蓝图。现在到2020年只有三四年时间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到了需要一鼓作气向前冲刺的关键时期。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任务艰巨繁重，仍然是等不得、拖不得、慢不得。全省上下必须始终保持专注发展转型发展战略定力，坚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全省工作主题不动摇，上下一心、团结奋进，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坚定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奋力推进“两个跨越”，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

一要突出稳定增长抓落实，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预期目标。二要突出“一号工程”抓落实，依靠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活力。三要突出“头等大事”抓落实，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四要突出绿色发展抓落实，加快推进美丽四川建设。五要统筹区域发展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形成多点多极竞相发展新格局。六要统筹城乡发展抓落实，以信息化引领城乡一体发展。七要统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抓落实，有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八要统筹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抓落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证。

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的伟大征程中，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担当。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战胜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始终保持夙夜在公、昼夜兼程的敬业精神，示范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拼搏实干，就一定能汇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任何艰难险阻，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如期实现。

——摘选自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1月20日在省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2017年01期
/总第43期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顾　问：
王承先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鲜于浩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晓晨

副主任：
李　仁　江红英　郭生春

委　员：
谢海彬　周锐京　戴忠东　严仕兵
王　皓　马善思　屠火明　魏家骏
彭本瑜　邱　俊　李思源　敬东阳
唐广生　张　亮　余崇威　罗兴林
蒲鹏程　李　勇　侯立新　蒋吉平
罗之聪　师　伟　徐永利　王春黎
肖　飞　姜建康　尹克发

封　面：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

封　二：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

封　三：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省委决定刘晓晨同志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封　底：
资阳市安岳县燕桥村新貌

卷 首

0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1月20日在省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摘选）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04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曲青山

07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迪
——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 陈　松

改革开放

11　宋宝瑞同志对20世纪80、90年代四川改革开放历程的回顾与思考（上）
/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资政新篇

15　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
——四川最早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析读
/ 宋　键

19　英雄不容诋毁　历史不容戏谑
——黄继光英雄形象不容置疑
/ 刘　全

人物研究

33　抛弃高官厚禄追寻党的足迹
——追忆朱德元帅早期革命活动
/ 张继禄

专题研究

25 《邓小平文选》中的城市建设思想

/ 刘祯贵

28 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
对绵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段 雯 黄隽颖

红色诗文

38 封封红色家书 拳拳报国激情
——在家书品读中走进革命烈士何秉彝

/ 高 华 江 明

史海钩沉

42 长征路上彩号连

/ 许国胜

动态窗口

47 》着力扶“志”与扶“智” 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刘晓晨主任调研广安区悦来镇方寨村脱贫攻坚工作

》省委党史研究室到过街楼社区开展“走基层送温暖”活动

》达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莫怀学到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指导工作

》广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立云出席《市委文献资料选编》征编工作会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俊辉看望慰问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干部职工

》《中国共产党达州历史》(第二卷)、《中共达州市委执政实录》(2015年卷)同时出版发行

》绵阳市盐亭县召开《中国共产党盐亭执政实录(2016卷)》编纂动员会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2017年新春下乡送温暖行动”走进宣汉县三墩乡大窝村

刊名题签：何应辉

《四川党史》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 严仕兵

编辑部副主任：蒲志明 马 睿

责任编辑： 王 植

美术编辑： 《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91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17年02月
- 印数：2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文/ 曲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阐述了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又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话题，本刊专门邀请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撰写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全面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深刻阐述了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为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指明了努力方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好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理论是实践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又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它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的文化理念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内涵是什么呢？他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是从三个层面来论述“文化自信”基本内涵的，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内涵包括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对历史沉淀的文化积累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相信它们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经受住各种考验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有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相信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指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的阐述是与对文化自信内涵的阐述相一致、相贯通的，他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应该是他关于文化自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时，就高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旗帜。但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告诉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现成教条，而是作为观察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应该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们党的95年历史中，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举旗亮剑，谋篇布局，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旗帜和指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曲折没有中断，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不可比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为底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条件。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人文魅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丰厚的智慧结晶，又在与不同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汲取了外来文化的优秀养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使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是广袤而深厚的土地，中华民族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孕育了中华民族高尚的灵魂，赋予中华民族蓬勃的生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精心耕耘，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文化遗产的智慧推进治国理政，用昂扬的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来自于中国人民，党内政治文化也是建立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革命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移、顽强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我们党在95年历史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作出了三个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三是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入5000多年中华民族的盛衰兴败大变迁中，植入170多年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中，植入95年波澜壮阔的党的历史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不言自明，“四个自信”油然而生。革命文化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展示着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深刻蕴含着党团结凝聚、纯洁先进、成功发展的秘诀。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包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革命文化对于教育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党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光荣传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就开始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党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这个主体内容极其丰富，形式极其生动，我们需要进行认真地提炼、总结和概括。

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而抓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必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员干部经常接受文化的熏陶，不断提升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就能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如果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所以，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构建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十分重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迪

——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文/ 陈松

“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深刻总结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全面部署，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纵观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与实践，既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也经历过惨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在从严管党治党新常态下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进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都具有重要借鉴与启迪意义。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基本准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原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制度优势。1922年，党的二大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第二十四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是我党以党章的形式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初步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一是下级和上级党部均由党员选举产生；二是各级党部向党员定期做报告；第三，下级党部一定承认服从上级党部的决议。1945年，党的七大进一步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来概括党的民主集中制。从党的历史进程来看，党在长期实践中既积累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有过惨痛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张国焘等人为推行其错误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甚至对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接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一度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异；“文革”期间，党的民主

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党在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党内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和活跃。历史一再警示我们，如果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不仅会使党内政治生活死气沉沉，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不到贯彻落实，而且极易为党内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危害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当前，在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必须在各级组织中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党内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同志与同志等重要关系，正确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要防止集中不够，搞自由主义，又要防止民主不足，搞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独行。

二、规范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

党的组织生活通常是指党员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员大会和党小组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单独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就要被开除。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党员如果连续六个月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就被视为自行脱党，由支部除名。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提出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要求，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生活作为党的生活的基础，“是党的生活中其他活动不能替代的重要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以“三会一课”为主要内容的党内组织生活经常性教育机制，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经验表明，离开党的组织生活或组织生活不健全、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就失去了正常开展的基础。健全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既能活跃党内气氛，增进党员同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又能达到交流思想、消除误解、统一认识的目的；不但是维护党的性质和宗旨、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的重要形式，也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毋庸讳言，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当前一些地方和领域的党组织生活出现了一些不到位现象，有的甚至敷衍了事，组织生活质量难以保证，严重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因此，在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需要经常和定期开展组织生活，特别要在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上下工夫，进一步推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三、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保障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党的力量所在。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紧紧地把纪律和规矩建设抓在手中。1921年，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纪律，如第六条和第十四条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说明，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17年来的斗争经验，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从党的实践历程来看，只有政治上清醒，才能有行动上的自觉;只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从入党誓词到《中国共产党章程》，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六条规定”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红岩烈士的“八条建议”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格的纪律和规矩，缔造了我们党的品质，积聚了我们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强大力量。事实上，我们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历史就是一部严明和坚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历史。土地革命时期，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成为党面对白色恐怖包围必须坚持的首要政治纪律；红军长

征胜利后，提出了“四个服从”，克服了张国焘等严重破坏党的纪律行为带来的严重危害；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党全军建立报告制度，坚决克服了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党的纪律监督机制逐步得到规范；改革开放初期，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御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维护了全党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党的十四大以后，加大了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案件的查处力度，维护了党的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肃查办了周永康之流严重违纪案，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历程雄辩地表明，不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必须从严明党的纪律抓起，保证全党集中统一和行动一致，从而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党所指引的目标奋进。因此，在从严管党治党新常态下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必须坚持把守纪律讲规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肃查处各种顶风违纪违规行为，肃清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非组织政治活动，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

四、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的重要基石

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成熟的根本标识。有了制度做支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委制等，使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运作更加规范化，为发展党内政治生活奠定了重要基础。“文革”期间，原本就比较薄弱的党内法规制度遭到空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中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不到落实和发扬。改革开放以后，党科学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法规，全面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内政治生活实现良性运转。进入新世纪，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创建力度空前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员权利保障、党内民主监督，到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廉洁从政，再到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

党员纪律处分等，均制定了相应法规条例。经验表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好作风、好传统，一旦形成科学完备的制度，就具有稳定性、严肃性，就能成为巩固党内政治生活成果之有力工具。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历程同时标明了这样一条政治逻辑：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沿着正确轨道，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迈进。唯如此，党内政治生活才能真正健康、稳定、有序、有效开展。因此，在从严管党治党新常态下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就必须根据党内政治生活发展新动向，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发展，继续完善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体系，以实际可操作性具体制度来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

五、充分的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开展的重要标志

党内民主，就是在党内生活中，根据党章和其它有关规定，党员按照有关的民主程序和形式，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民主的发展状况总是同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党所面临的斗争任务、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以及党内的思想状况等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党内民主能否得到充分发扬，是衡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志。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发展党内民主，而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广大普通党员。由于过去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长期没有建立健全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机制，对普通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保障不够，致使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犯错误的时候，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制止错误的蔓延，从而挫伤了广大普通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二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及党的中央依据党章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都对党员的权利及如何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做了详细而务实的规定，成为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举措。事实表明，这些规定落实得如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影响极大。因此，在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一定要充分发扬和保障广大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如果忽视广大普通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势必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只有不断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切实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建立健全广大党员对党内政治生活参与的长效机制，才能促进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健康发展。

总之，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梳理现实问题、制定相应对策，从而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具有实质内容，能够解决突出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紧迫。只要坚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我们就一定能形成好的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各项战略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宋宝瑞同志对20世纪80、90年代四川改革开放历程的回顾与思考（上）

文/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

【编者按】按照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新要求，遵照省委部署，省委党史研究室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三卷（1978-2002）。为征集和保存党史资料，更好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省委党史研究室启动了四川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工作，邀请历任省委、省政府领导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四川重大决策的谋划和实施过程。

近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了对四川省人民政府原省长宋宝瑞同志的访谈。宋宝瑞同志对上世纪80、90年代四川农村体制改革、商业改革、对外开放、国企改革、旅游强省战略、住房改革等重大事件的决策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思考。

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解决物资短缺问题

我是1986年到省委来工作的，之前在自贡焊条厂当过厂长兼总工程师。1983年，组织上让我到自贡市委做副书记。我当时觉得学了多年的专业、还有外语扔掉可惜了，所以2月份下了通知，我就没去报到。到了5月2日，王效才书记和隋德美市长到厂里来找我谈话，我以为领导是要来参观工厂，还加班大扫除。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说：今天不去车间，到你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效才书记就问我哪年入党的？我说1958年。他说：你是老党员了，知道规矩不？我说党章党规还是知道的。他说：那首先就得服从党的分配，你3个月都不来报到，什么态度？今天我们俩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的，如果你还不去报到，告诉你，给你处分以后，你还要报到。于是，我5月3号就报到去了。

到任后组织上让我解决物资供应的问题。那时的基本经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供应就靠发票证，一张大纸一共54张票，连三个木耳、两根黄花都要发供给票，基本上什么都要凭票。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时候中国能把物资供应票取消了，那就不得了，当时想的是恐怕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那时候的四川物价很便宜：鸡蛋2分钱一个；最好的五粮液7毛8分一瓶；肉7毛8分一斤，每人每月一斤。可是这么好个地方为什么就是吃不饱？大家也苦恼这事。原来搞生产队、人民公社，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吃大锅饭，农民没有积极性。我当学生的时候曾到农村帮社，一敲钟，一吹哨，农民拿着铁锹、拿着镐头就出工了，但到地里“红旗飘飘不猫腰”，东吹西吹。路上来一辆车，大家就蹲在那看；来一个女同志，由头看到尾。因为你就算干得再好，男同志一天8个工分，女同志6分或7分，好不好都差不多，没有劳动积极性。

解决供应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对改革高度重视，四川当时设有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就搞了党政分开，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是农村改革。四川农村改革起步很早，标志就是广汉向阳公社把人民公社的牌子摘掉，包产到户，基本走的是这个路子。刚开始中央文件精神跟后来搞的还有点

农民丈量土地，准备包产到户。

差别，就是中央文件精神只说在困难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在发达地方还维持原状。可一到农民那儿基本上全部都包产到户了。

包产到户一下就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川收小麦跟收菜籽儿还有插秧都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那是非常紧张的。过去省委到麦收季节，还组织干部、学生下乡支援生产，部署抢收抢种，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但也不解决问题。没想到包产到户、市场经济一搞，一下就解决了。它的实质就是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无穷的。一包产到户，打多少粮食那都是你的，吃不饱的话那是因为你没干好。所以农民不用敲钟就会下地了，干得挺好。

农村体制改革，四川最大的创造，从生产关系来说，一个是把公社的牌子摘掉了，一个是包产到户。从生产力来说呢，经过大量调研，取消了三季稻，因为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只有川东南，仍然保持三季稻。后来又有再生稻，把第二季那茬留高点再撒点化肥就行了。很快粮食、猪肉各种物资都丰富了，整个供应票证全部都取消了。我想这就是农业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

扶持个体工商户，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1986年省委决定让我任省委常委兼体改委主任。当时四川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省委领导下，由我具体来抓。

我到任以后，首先就搞商业改革。回顾那时商业的情况都到了什么程度：我在厂里头当厂长兼总工程师时，经常到成都出差、跑业务，厂里只有一个破吉普车，还不能经常用。因此，我们出差，非得有两个人。从自贡早上坐火车到成都就下午6点多钟了，一下车，一个人去排队住宿，一个人就得赶紧排队吃饭。如果是一个人，那吃得了饭就住不了宿，住得了宿就吃不上饭，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根据中央改革的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意见，大的改革当时不敢动，就先干点小的，干坏了影响也不会太大。我就建议从商业开始，针对小商店进行商业改革，就是鼓励、提倡个体户和私营商店。

刚开始的时候，真正搞个体经营的主要是无业

人员，也没有得到多少优惠政策，无非是贷款比较容易。结果一发展起来，是红红火火，局面大不一样。国有和集体的商店、供销社的领导们就跟我提出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经营这么艰难，就是因为你们提倡个体私营企业。国有和集体商业占据多种优势，经营反不如个体经济，我百思不得其解。首先商业的口岸很重要，国有和集体的商店都占有最好的口岸；其次人才也强过个体私营企业，有些饭店厨师级别很高，又经营了几十年，可竞争力就是不如个体私营企业。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l）写了本书，我详细看了，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从现实来看，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因为没跟他的利益挂钩。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后来，我给他们举了个例子，上海最有名的南翔包子店一个伙计，每天忙得不得了，累得要死，就想如何不那么累呢？就往那个馅里放不卫生的东西，于是顾客都不来了，他也就不累了。当然后来处理了他。这些例子很多，实际上是机制的问题。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是全民经济，干得多你就多得。像个体私营商店，早上9点就开门，一直到晚上12点，如果生意好再晚都干。卖东西也是，私营个体商店那是卖得越多越好，所以局面不一样。

后来国有和集体的企业也开始搞起了承包制，一年完成多少任务，超过多少奖励多少，逐渐竞争就更激烈了。现在四川搞了多少宾馆，入住率很低，再不用排什么队了，还抢着拉你去住，而且服务到位。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主抓“一条线”实现突破

四川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问题。我认为发展县域经济极端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的省委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了丘陵大县上。四川一般的人口大县基本上都在丘陵地区，像甘孜阿坝人就很少，川西平原一个县也就四五十万，而100万以上人口大县大都在丘陵地区，特别是时任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的家乡仁寿县，人口有160万。如何把四川丘陵大县经济搞起来，把它搞好，在当时是个大难题。因为这些丘陵大县是产粮、产油、产猪大县，却是财政穷县。当时每年每个丘陵大县补助200多万，让他们发展经济。搞了若干年，成绩是有的，但成效不是很大。我认为丘陵县像内江等地，人们的文化程度、文化素质还可以，教育还是不错的，但是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地上是每人平均8分地，地下无资源，这种基础如果搞工业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四川最有条件的还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就是北边到绵阳，南边到乐山一带。平原县的农业基础很好，都是自流灌溉，人文条件、交通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总体来讲都很好。我到沿海一看，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像山东沂蒙山区照样不行，还得是青岛、烟台比较好；像福建，就是习主席曾经工作的地方，也只有福州跟厦门发展得好；广东呢，就是珠江三角洲发展得好。所以我就向汝岱建议：我们扶持丘陵大县这个思路要改变，第一要发展县域经济；第二发展县域经济的重点是在川西平原。结果在常委会上达成了统一认识：第一抓县域经济，第二县域经济的重点就是先抓川西平原这条线上现代工业基础比较好的23个县，当时就叫“一条线”，并决定让我当这“一条线”的“线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省上一分钱没给，就给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权力下放，另外金融要对这“一条线”大力支持。各县的积极性非常高，发展很迅速，县级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后来有人提出人字发展，就是在这一条线旁边还加上一撇，我就说现在条件还不够，咱们先把这部分搞好，那一撇以后再画出去。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的整个工业基石大都集中在这“一条线”上。

组建省招商局，推进对外开放

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它的地域条件密切相关，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一样。有人说四川人水平低、

盆地意识，实际上四川人非常解放，但是必须把开放放在首位，必须从国外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资金，如果四川省改革开放没有一个重大的动作，就没有希望。

那时候我给各部门的负责人说大家各负其责，干出成绩归你们，干错了我来负责，重大事情协调不了我来协调，我就扭着对外开放这个重点不放。当时外贸厅的工作包括劳务输出等等，任务很重，就觉得应该把招商引资独立出来，但因为刚搞了机构改革，大趋势是缩减机构，结果在第一次省长办公会上大家不同意。我也不死心，一个一个谈话做工作。过了一个多月召开第二次办公会才得以通过。

1998年成立省招商局，由外贸厅副厅长唐利民兼招商局局长。我当时给他下了硬指标，也给了他相应的支持：第一，两年之内要达到实际引入外资每年108万美元以上，实实在在的108万美元落到四川、花到四川才能算；第二，要人给人，开办费要多少给多少；第三，只要不是去旅游，随时可以出国考察，不受限制。唐利民同志头脑清醒，不分昼夜地干，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外商来，都要请我出面。当时最早的合资公司，就是乐山无线电厂跟摩托罗拉合资的菲尼克斯半导体有限公司。摩托罗拉在天津那儿有一大片，一个搞半导体的企业，引进摩托罗拉以后，从设备到管理整个变得现代化。其实与外商合作最重要的，第一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必须真诚地对待，你对他真诚，他对我们就非常尊重。记得有一次，菲尼克斯半导体有限公司老总米罗遇到几个问题，夜里9点半钟到绵阳找我，我正在开会，就马上把会议停下来，并叫上省政府副秘书长辜仲江，一块儿听他说了6个问题。我对仲江说：一个礼拜时间，你必须负责一个一个落实，我到时要检查。一个礼拜后仲江就答复说全部都解决了。我又打电话给米罗，他也说全落实了，非常感动，更加坚定了他在四川投资的决心。

那时对开放我是亲自抓，其他像基本建设就由副省长邹广严负责，土地批给谁了？什么原因批的？列个单子；财政，由副省长张中伟签批，也列一个单子，每个月这两项必须在常务会上让副省长们都审核一下，没什么问题就通过。我只给谁批过经费呢？经济学家林凌和辛文，一人批了20万，因为要研究整个四川经济发展战略。此外我是一笔资金都没批过，一亩地也没批过，该谁分管谁分管，大家也没什么意见，比较团结。

（未完待续）

乐山菲尼克斯半导体有限公司外景。

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

——四川最早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析读

文/ 宋键

在中国共产党四川创建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重庆党、团地委就解除杨洵、童庸生误会而召开的民主生活会记录》。这是90年前四川早期党组织应中央要求召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记录，也是我党历史上保存完整的、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同志误会与分歧的最早历史文献。这次民主生活会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地委）召开，书记杨闇公主持，吴鸿逊为会议记录。与会的十位同志都是四川早期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四川省级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泛黄毛边纸上飘逸俊秀的字体背后，我们依稀可见90年前这些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他们赤胆忠心为革命，凭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把党组织的团结视为生命，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给当前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历史背景和事情缘由

1926年2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重庆地委）。重庆地委筹建前后各项工作的负责同志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成都、重庆等四川土生土长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如杨闇公（后任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吴玉章（后任地委委员兼宣传委员）、童庸生（后任团地委书记）、张昔仇（锡畴、锡俦）（后任团地委组织委员）、李嘉仲（后任地委候补委员）等，他们对四川实际情况非常熟悉，积极筹建四川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办事老成持重，擅长在群众中开展具体工作，在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另一部分是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在外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回来加强四川地方组织领导力量的青年才俊冉钧（后任地委委员兼组织委员）、杨洵（伯恺）（后任学委书记）、程秉渊（子健）（后任工委书记）、刘成辉（后任教委书记、团地委宣传委员）等，他们年轻有为，心高气傲，既有较为全面系统的革命理论武装，又有心理上的组织优势，但在与四川革命实际的结合上略逊一筹。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迥异，导致他们对于中共四川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四川革命运动的方略认识上存在有较大的差异与分歧，其中个别同志如童庸生、杨洵等特别要强的个性又加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从而使得这两部分力量在整合上一度出现障碍，龃龉暗生，直接影响到重庆地委在领导全省革命运动中作用的发挥。

杨洵是192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周恩来、赵世炎影响，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曾参加旅欧共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1925年7月受党的派遣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创办中法学校（四川分校）并帮助杨闇公等筹建四川省级党组织。然而，意气风发的他在重庆为筹建四川省级党组织工作半年多后却越来越不舒心，尤其是与后来出任重庆地委委员、团地委书记童庸生的合作共事倍感艰难，合作的不愉快大大影响了他的工作热情，他因此接二连三受到其他同志的指责和非难。杨洵最初也试图找童庸生沟通，可终日为四川革命活动奔走呼号的童庸生不以为然，反讥讽他小肚鸡肠。倍感委屈的杨洵一气之下，决定趁重庆

党、团主要领导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1925年底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绕过重庆地委临时负责人曾净吾，于1925年12月24日直接写信给党、团中央，即《杨洵给党、团中央的信——关于重庆工作的情况》。此信洋洋洒洒上万言，除了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团组织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与童庸生等合作上的不愉快外，杨洵还反映说重庆党、团组织存在“指导非人，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嚣”、“乱闹学潮”的问题，甚至指责重庆党的工作和同志是“无纪律，无计划，无训练，团体个人化，渝地的地委员（不是全部）许多是不学无术，骄满嫉妒遗传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盘，各不闻问”。杨洵的信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对四川党、团工作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内部团结问题很令人担忧，“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彭述之语），因此趁杨闇公、童庸生到广州参加完国民党二大转道上海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以及在上海的川籍党员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和批评，并反复嘱咐要求杨、童二人回到重庆后立即召集党、团负责同志和与此事有关的同志，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消除同志之间的误会与分歧，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杨闇公、童庸生不顾舟车劳顿，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上海，本想全面汇报重庆地委筹建顺利、万象俱新的工作，孰料一见面就遭到中央领导严厉批评重庆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开始简直是满头雾水，细问才知是杨洵直接给中央写信告了“御状”。杨闇公、童庸生两人身为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一方面当然也责怪杨洵动不动就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捅到中央的做法太冲动，有欠思考，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件事，不消除同志间的误会与分歧，势必引起更多误会与分歧，进一步影响组织团结，甚至削弱党、团组织的战斗力，而这正是他们所最不愿发生的事情。他们决定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重庆后立即召开批评会，解决这个问题。

二、民主生活会的具体情况

1926年4月15日晚，在重庆老城区二府衙70号杨闇公家的底楼，一张木桌旁依次坐着重庆党、团地委的10位主要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中共重庆地委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秘密举行。这次民主生活会目的十分清晰，就是要澄清事实，消除误会，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据吴鸿逊的记录，整个生活会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主席杨闇公报告开会理由。他先把杨洵去信中央报告与童庸生的误会及中央对此事的重视、对四川党团组织的批评作了介绍，并开门见山地强调“现在我们尽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同志们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害团结的工作进行”。简短的开场白后，他请引起误会的双方杨洵、童庸生各自对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并要求其他同志对两者陈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并补充未尽相关事宜。

接着杨洵对自己去信中央的原委进行了陈述。他详细报告了信中主要涉及到的十个问题，他的陈述清楚地反映了他与童庸生心生隔阂及日益加厚的过程。根据分工，杨洵主要负责中法学校教务事宜，组织已经决定要在报纸上登招生广告，开学在即，时间紧迫，可过了一天多还没见动静，于是他写信去质询负责办理此事的童庸生。孰料童庸生不仅没及时说明广告迟登原因，反而回了一封长信，指责杨洵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好共事，要杨洵多读唯物史观；杨洵自此心存芥蒂，不久又因中法学校排课事宜再起风波，感觉童庸生借口其他事情多不再来中法学校上课，因而也断然拒绝童推荐喻凌翔来教任外国地理；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发动学潮事情上，杨洵认为群众基础不足，建议应该停止学潮运动，遭到童庸生的坚决反对；在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因肃清案被通缉离开重庆前往广州开会后，杨洵自忖能力、资历都应该得到组织的信任，但杨闇公、童庸生反而交代由曾净吾暂代主持

工作，因而心有怨气，时常与曾净吾的意见相左，遂自行决定取掉了中法学校办事处的牌子，还以因邮局检查为由撤销贩卖部，被曾净吾批评有树私人势力把持地盘之嫌。曾净吾要求杨洵不要只关注中法学校教务、一味研究理论，决定派杨洵前往外交后援会任事；对新的工作，杨洵觉得并非自己所长，又加上他认为当时后援会的事黄均尧干得不错，而童庸生对黄工作的评价并不高，因而心有顾忌，一口回绝了组织交派的工作。杨洵自己觉得很委屈，在中法学校研究理论、为党培育干部也是革命工作，为何得不到其他同志的认可……所有这些不适，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自己又不愿与临时主持工作的曾净吾纠缠不清，干脆采取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方式。不料大家都指责他“站在团体外说话”，认为这是很不地道的“告状”行为。当然他也明白自己报告中央说重庆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有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嫌疑，因此在陈述时强调自己只是希望防止这两种倾向发生才好。

童庸生对杨洵提及的事情作了一一的回应。童庸生先是真诚地诉说了自己的心声：“我想我们在沪时十分的诚恳，得着杨洵同志要回川的信，我们及此地的同志，都非常喜欢，希望以后共同努力工作，因此小事惹起他的误会太觉无味。”接着对引起杨洵误会的事宜进行了逐一解释：招生广告没有及时登出确是因经办同志延误，报社临时加价导致，而又遭到杨洵的误解质询，因而一气之下，语气不加斟酌就回了一封长信；辞掉中法学校教授课目确是因忙于党、团组织创建及宣传鼓动工作，并非针对杨洵、不支持他的工作；推荐喻凌翔到中法学校任教主要是认为喻具有这个能力，且是安置已暴露同志的生活迫不得已的考虑；女师学潮不采纳杨洵停止运动的建议是不愿打击学生的革命热情，怕失去广大青年的支持；黄均尧去职后援会是因已支取忠州学校薪酬，并非故意要强杨洵所难，自己批评均尧也是出于公心，并在会上当面提出的；地委交由曾净吾主持工作也是因为杨洵一味推让，每次正式邀请参加会议、征询意见杨洵都不肯坦诚相待，总是消极回避……最后，童庸生对杨洵无端怀疑同志故意陷害中法学校的做法也表示了极度的不理解。

杨洵、童庸生两人陈述原委后，张昔仇、喻凌翔、冉钧对相关具体事宜就各自参与和熟悉的情况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弄清基本事实后，按主席杨闇公的要求，与会者对心生罅隙的双方进行诚恳的批评。除吴鸿逊忙于记录外，其余的同志都对童庸生、杨洵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刘成辉批评童庸生对团体工作虽然热烈，但对同志态度有些粗暴，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杨洵平时工作不够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疑心重，个人误会不信任组织。程秉渊批评童庸生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洵态度不端正，对工作不努力，不明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李嘉仲批评童庸生个性太强，自信力太强，考察事实不精细，杨洵则存在小资产阶级心理太甚、观察事情甚为不彻底的毛病。张昔仇批评童庸生过于急躁操切，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而杨洵则态度不诚恳，经常站在团体外批评别人，容易引起误会与分歧。喻凌翔批评童庸生对同志经常态度不好，性情急躁，每每感情用事，而杨洵则自视甚高，经常自夸，富于小资产阶级心理，没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冉钧批评童庸生生性急躁，经常感情用事，杨洵则组织观念不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工作不努力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盲目自信疑心太重。

各位发言者对童庸生、杨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公正严谨，批评直指要害，完全没有什么童庸生是四川党、团组织创始人和杨洵是中央派来加强四川工作的早期老党员之类的顾忌。中肯的批评让童、杨二人心悦诚服，会议记录者虽然没有给我们描绘与会者、特别是受到批评的童庸生和杨洵两人的神态，但是，几乎在每个同志批评结束以后，记录者都不厌其烦地写下“童杨接受”或“接受”的字样。杨洵在接受这些畅快淋漓的批评意见后在会上当即表示：“从庸生那封信起到腊月止，（对）团体工作不甚了解，如能象今夜这样开会说明则不致发生那些误会了。”

大家畅所欲言后，杨闇公要求杨洵和童庸生进行了同志间相互的批评。杨洵说童庸生态度不好望改正。童庸生批评杨洵感情不受理智支配，小脑大于大脑，头脑不冷静，冲动性大，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稍困难的总是推诿，以后希望注意改正。

尽管杨闇公与童庸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私谊甚好，但在大家发言过程中，作为会议主持，他始终不偏不倚，没有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真正做到了让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所有人发言完毕后，杨闇公进行了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总结："庸生自信力太强，冲动性大，个性也强，加以感情变换太大，作事要求很强，均易现出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杨洵同志工作太不努力，误认个人为团体，既有怀疑应先向地方解决，不宜站在团体外面去谈话。因此引起中法同志对地方不信任，并常给同志对团体分裂的暗示，这全是个性太强、小资产阶级色彩太浓的缘故"。杨闇公恳切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最后，杨闇公以异常严肃的态度强调："看哪个才是真心的布尔什维克化，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的，……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的，不要因一点小事误会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绝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所以杨洵同志不明了团体与个人的关系才有此误会。以后如有怀疑的地方，在批评会上和常会上尽可提出来赤裸裸说和建议，不宜站在一边说话。"

三、批评会的成效及历史启示

这次批评会是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可谓成效显著。童庸生、杨洵自此彻底消除了误会，特别是杨洵，放下了疑虑重重的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干工作。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刘成辉、杨洵等后来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余诸君也都为四川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经过这次批评会洗礼的四川党、团组织顺利完成了两部分力量的整合，以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的崭新姿态投入革命工作。中共重庆地委担负起领导四川全省党组织的重任，随后，重庆地委增设工人、学生、妇女、教育委员会，程秉渊（子健）、杨洵、程志筠、刘成辉分别担任书记，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改组，成为全川团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书记，宣传委员刘成辉，组织委员张昔仇（锡俦），全川党、团组织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为致力推动四川国共合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军事运动的不断高涨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四川党、团组织及同志们的出色工作赢得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报告》中专文指出："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这次卓有成效的批评会堪称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民主生活会的光辉典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民主生活会程序严明，主持人公正无私，争议双方明辨事实、摆述道理，参与者忠言逆耳却良药利病，最后的总结深化主题，强调团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面问题、光明磊落、敢于担当、勇于纠错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在这次生活会上展露无遗。细读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生活如此源远流长，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不愧为治党的"良药"和"武器"。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重读这份四川最早的省级党组织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记录，对我们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英雄不容诋毁　历史不容戏谑

——黄继光英雄形象不容置疑

文/ 刘全

黄继光

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无硝烟战争”已悄然打响，敌对势力组织策划和煽动一部分人此起彼伏地肆意歪曲抹黑我们的英雄，轮番将历史虚无主义的毒箭射向我们的英雄，他们企图从精神上动摇、摧垮人民群众对英雄人物的崇敬，进而瓦解民族自豪感和“四个自信”，最终实现其背后不可告人的颠覆意图。四川籍英雄也在被黑之列，如网络上有所谓的网民提出“黄继光长的也是血肉身躯，凭什么能够堵住机枪眼呢?”并以所谓的数据推理来恶意否定黄继光堵机枪眼的壮举，严重抹黑英雄人物形象，此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在网络平台上一经幕后推手炒作，立即持续发酵扩散，混淆了部分群众特别是容易受蛊惑的青年网民的视听，动摇了其对英雄人物和当时历史的正确认知。为正视听，对否定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所谓“质疑”予以有力反击，对诽谤和诋毁民族英雄的谎言进行揭露，以事实还原历史，坚决捍卫自己民族英雄和历史，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课题组，深入黄继光家乡和生前所在部队，寻访英雄的成长环境和空间，重拾真实的历史细节，重新证实尊重事实、合乎逻辑的结论。

一、历史因真实而永存，不增不减

黄继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身体堵机枪眼，从而为其所在部队赢得极为宝贵的冲锋时间，为抗美援朝战争进程中一场战斗的阶段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段历史提出合理思考是网民的权利，但聚焦点显然不应该放在黄继光的身体能否堵得住机枪的持续射击，也不应该放在网络上署名为穆正新的博文《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之一至之八系列文章）中提出的黄继光牺牲后新闻报道版本差异、新闻图片差异、牺牲情节描述差异和亲历者回忆差异上，而应该放在黄继光成长历程中形成的光辉品质，放在当时战场上危急关头黄继光为什么能做出大无畏的牺牲上。

成长经历磨练出了黄继光作出英雄壮举的勇气和品格。黄继光1931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石马乡（现名继光镇）沟岔村（现名继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黄际广，祖宗三代受尽地主阶级的压迫。黄继光的父母养育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黄继光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黄继光童年时期家境艰难，六、七岁就光着脚丫与家人一道下地砍柴、割草、挖野菜，艰难度日。10岁时，他的父亲积劳成疾病倒，为了维持生存，父亲向地主借了一担油，可不到两年，地主就催逼还三担油。此时，黄继光的父亲尚在病中，连医病的钱都没有，更无法还油钱，于是地主勾结当时的乡政府抓捕了黄继光的父亲，并百般折磨摧残。黄继光的母亲只得卖掉家中租种的三亩地里的青苗，赎回已经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父亲。黄继光的父亲回家后不久就含恨去世，

但地主仍要追债，强行收回了黄继光家赖以活命的三亩地。由于生活无以为继，黄继光的母亲一度因为家里多日没有粮食吃，想带着几个孩子一同自尽，后由于黄继光的反对加上邻居的接济，一家得以活了下来。黄继光12岁时，地主逼迫黄继光帮工抵债，黄继光在帮工过程中累死累活，还要经常遭受地主的毒打、凌辱。黄继光所在村的甲长家的狗被别人打死，甲长诬赖是黄继光所为，并把死狗绑在黄继光身上，让他背狗游乡。阶级仇恨对黄继光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形成嫉恶如仇的性格，形成反抗压迫、实现穷苦人翻身的强烈愿望。1949年12月，四川中江县迎来解放，黄继光积极参加清匪反霸斗争，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儿童团团长，曾带领民兵活捉逃亡地主，搜出伪保长私藏的枪支弹药，被评为民兵模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后，国内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军。黄继光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被分配到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实地看到战场上一片焦土，处处是美军炮弹留下的弹坑，空气中散发着浓厚的火药味，黄继光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马上加入到战斗中去多消灭敌人的愿望更加迫切。但此时作为通讯员的黄继光根据作战需要被留在后勤，他见一起入伍的老乡吴三羊、肖登良在战场上消灭了不少的敌人，很羡慕，也因自己未能亲手杀敌而更加心急。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在通讯员岗位上工作干得很出色，荣立三等功一次。1952年7月，黄继光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战场的残酷激发了黄继光作出英雄壮举的勇气。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开始向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联合国军心窝的一把钢刀。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联合国军动用两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发动了连续进攻。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必须在天亮前占领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联合国军设在山顶上的集团火力点压制住志愿军反击攻势，志愿军部队不能前进。第2营参谋长命令第6连组织爆破组炸掉它。在实施爆破中，第6连向敌军发起五次冲锋均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而且一个又一个战友先后倒下牺牲。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他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交给营参谋长，恳切地说："把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营参谋长沉思片刻后，决定把任务交给黄继光，并任命黄继光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要求他一定要完成任务。黄继光接受任务后，立即提上手雷，带领战士吴三羊和肖登良向敌军的火力点爬去，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无畏惧，忍着伤痛，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军火力点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接连投向敌军，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愿军反击部队的冲锋再次受到阻止。这时，黄继光再次负伤倒下。天就要亮了，黄继光身边已无弹药，身体又多处重伤，他顽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疯狂射击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堵住敌人火力点上最后一挺机枪的枪口。这一壮举极大震撼了敌人，他用身体为部队创造了一个十分珍贵而又短暂的冲锋时机，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利用黄继光用生命换来的难得机遇，部队吹响了冲锋号，并很快占领了阵地，全歼敌守军2100余人。

这就是黄继光舍身堵机枪眼的基本过程，历史因真实而永存，英雄因壮举而受人敬仰。

黄继光牺牲后获得的荣誉铭记了英雄壮举的伟大意义。黄继光牺牲后，《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1日第1版对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报道。为表

彰黄继光视死如归、无所畏惧的伟大精神，1953年4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他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镌刻在上甘岭背后五圣山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黄继光牺牲后曾多次接见黄继光的母亲。他的家乡中江县石马乡改名为继光乡。战后，所在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他“模范团员”称号。1962年10月，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政府建立了黄继光纪念馆，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1982年纪念黄继光英勇牺牲30周年时，邓小平为黄继光纪念馆的黄继光塑像题字：“特级英雄黄继光。”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黄继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二、诋毁因虚无主义而生，居心叵测

近年来有所抬头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思潮表现形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后十分活跃，它以“反思历史”为名，散布谣言，歪曲历史，尤其是运用极其卑劣的手段，玷污和贬损英雄模范人物，企图从质疑、否定英雄找到突破口，解构信仰，解构历史。

黄继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网络上攻击的众多英雄之一，他们提出：“黄继光并不是什么“打不烂、煮不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根本堵不住机枪眼。堂而皇之的依据是，在当时美军战场上使用的机枪为班用7.62mm的M1919气冷式，营级12.7mm的M2，一发重机枪子弹的出膛能量是两千焦耳，基本上可以把人体打成两节：“而如果持续射击的话，可以把尸体打得残缺不全，直接扯烂。就算真的盖到枪口上了，一个十几发的长点射，不仅上半身不知道去哪里了，就是强大的能量也足以把人推出老远，想堵是堵不住的。”这种披着“科学数据”外衣的质疑表面上具有一定迷惑性，但实际上是企图以机械的数据抹杀英雄的壮举和精神，既站不住脚，且用心险恶。

一是这种质疑完全忽略了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出发点。黄继光最后参加的战斗是上甘岭战役，这场战役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在仅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人的兵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的一天达30万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发射炮弹40万发。阵地上草木荡然无存，岩石构成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在这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火海弹雨中，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主要原因在于有无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李继德是黄继光的战友，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战场的惨烈和那场战斗的艰难：“敌人炮火相当厉害，有毒气弹、烟幕弹，我们的枪大多是‘单打一’……6连伤亡得差不多了，团长给营长下命令把4连顶上去。敌人又反击了，4连伤亡得又差不多了，团里又下命令，3营9连急行军再去抢山头，夺下了阵地。敌人又上来了一个团，9连伤亡了一半，进入了防空洞。”战场进入残酷的胶着状态，敌人炮火占有极大优势，凶猛轰击志愿军阵地，不给志愿军喘息机会。为了打破炮火压制，取得胜利，2营受命不计一切代价，拿下并守住597.9阵地。但反击时遇到敌人地堡里两挺机枪的阻击，志愿军牺牲一拨上去一拨，上去一拨又牺牲一拨。黄继光就是在战斗进入极端白热化的紧要关头，自身负伤，且自己携带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作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暗堡机枪的决定。从逻辑上分析，他当时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己受伤的身体再为

战争的胜利做一点贡献，如何再为祖国作出更有价值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仅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就有38位在战斗中用身体堵敌人机枪眼或者与敌同归于尽来争取进攻时机的英雄，黄继光是英雄群体的代表，突出展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也注定了历史虚无主义者永远无法成为黄继光那样崇高伟大的人。

二是这种质疑完全抹煞了黄继光牺牲的历史证据。黄继光用自己身体堵住敌人机枪眼，并不是敌人的机枪就此失去了威力和作用，只是黄继光用自己身体暂时挡住了敌人机枪子弹飞向自己的战友和部队。这个时间内，敌人的机枪仍在射击，黄继光的身体很快血肉模糊，但他争取到一个难得的契机，部队能在他堵上机枪眼的一刹那发起冲锋。历史也正是这样的，在黄继光堵上机枪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迅速冲出掩体，仅用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李继德在战场上曾亲眼目睹黄继光堵敌人枪眼的过程。李继德回忆说，他看到英雄已经被子弹打烂了，“后背血肉糊拉糊拉的，不成形了。”除了目击者，珍贵的历史照片也证实了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在包含了黄继光正面全身照和半身照的照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英雄保持着双手高攀、扑向敌人枪口时的姿势，也能看到照片中黄继光用来封堵枪口的胸部以上部位被大量子弹击穿，这张照片就珍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黄继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的特级英雄，空降兵军史馆大门一侧就是黄继光的雕像，馆中珍藏着原始的记载黄继光牺牲过程的《黄继光报功材料》、《功臣简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记功命令（功字第五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颁发给黄继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奖状》。至今，黄继光战友李继德也还清晰记得黄继光壮烈牺牲的细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在这时，我看见已经爬到地堡下的黄继光，猛地弓着腰起了一下子，堵上了枪眼子。”李继德老人还通过记忆模仿还原黄继光的身姿，用痛苦的表情连说了七八个“哎呀”。英雄牺牲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冷冰冰地设想的那样，黄继光的身体被打散，而是黄继光忍受着子弹连续射入自己胸膛的痛苦，尽量多为志愿军赢取哪怕是十秒二十秒的宝贵时间，为部队反击创造一个契机。

三是这种质疑完全玷污了黄继光英雄事迹留给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1840年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深陷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为了抵御侵略势力，伟大的中华民族百折不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并未摆脱深重的灾难，唯独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扭转了民族的命运，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第一次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军队。黄继光的英雄举动为一场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有几十万像黄继光这样为了祖国安全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战士，才使

位于中江县的黄继光纪念馆。

得一个尚未完全解放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武器装备差距极大的情况下战胜了帝国主义头号强国和帝国主义联合军队。这场胜利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的志愿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为了维护人类正义事业和民族利益而随时准备牺牲的军队，黄继光的壮举是一大批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士的一个代表。抗美援朝的年代虽然已经略显久远，但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的军队和民族，从很大意义上讲，我们能拥有一个已经长达60多年的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那场战争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密不可分，我们的民族能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创造巨大的成就，也与那场战争中确立的民族自信密不可分。

三、民族因英雄而闪耀，扬清抑浊

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特性，因而历史给人的感觉是存在真实的同时也存在几丝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任意地揉捏史实，恶意地消费英雄人物。即便是想更清晰地看见历史中的场景，也应该经过科学严谨的考据，决不能假借科学推理之名天马行空地想象和臆测，更不能恶意诋毁、胡编乱造和任性涂抹历史事实。

近两年来，中央媒体和各地已经组织了力量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深入揭露和批判，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各种诋毁、污蔑英雄的网络段子明显变少了，戏谑历史、解构历史的言论少了。但是，我们也应该警醒，历史虚无主义只是暂时在舆论上退缩，甚至是潜伏，其出现是一个历史产物，其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护我们的英雄和历史，改进和提升我们维护英雄及历史的方式方法，及时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衍生言论，既要做到“善守者敌不知所攻”，也要做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

一是敬仰英雄，尊重历史。英雄往往是在自己民族发展中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人，英雄成就民族的尊严，是民族精神中的钙，是民族辉煌历史中的灯塔。没有英雄，民族自信就丧失了底气，丧失了精气神。因此，世界上走向强大的民族都是珍视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而那些曾经强大的民族走向衰落也是从诋毁自己民族英雄和历史开始的。1941年11月的一个寒夜，在莫斯科以西86公里的一个村庄，一位18岁的姑娘在焚烧德军马厩时不幸被捕，虽受尽折磨也不肯吐露半点秘密，最后被德军残忍地绞死。她就是被其同胞奉为民族英雄的卓娅。卓娅的牺牲曾激励苏联红军将士在前线奋力厮杀。让人心痛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牺牲多年的卓娅却被一支“毒箭”射中：“卓娅当年神经病发作，她不是烧了德军战车而是烧了老百姓的房子，被乡亲们送给德军处决的……”英雄卓娅被如此抹黑、污蔑、诋毁！曾经在战场上用身体堵德国碉堡枪眼的马特洛索夫，同时期也被污蔑成少年犯。苏联的英雄逐一被抹黑，精神支柱逐一被砍到，不久苏联解体，很多人的生活迎来“西伯利亚的寒冬”，而西方一些政客们却在壁炉边发出得意的笑声。当下，国际形势波涛频起，一些西方国家加紧策动“颜色革命”，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基因”战略早已剑指中国，而且已在各条战线隐蔽展开，动摇群众对英雄、历史的认识及信仰是其险恶用心的一个重要方面。黄继光牺牲后，志愿军在他牺牲的朝鲜阵地上刻下的文字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殉国，永垂不朽！”苏联的马特洛索夫倒下了，虚无主义又把枪口对准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历史不会重演，英雄的形象不是被任意揉捏的泥塑；真实的历史，也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此，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决不能任由网络诋毁历史上的英雄，决不能对篡改历史、戏谑历史的暗流听之任之。一个不尊重本民族历史和英雄的民族，也绝对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和敬仰。敬畏历史，敬畏英雄，我们才能清楚我们来自哪里，又要去向何方，才能清楚我们能做出怎样的成就，走向什么样的复兴。

二是主动回击，激浊扬清。在网络时代，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受众广泛地参与信息传播，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极为便捷，为了阻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守卫我们的民族英雄和历史。其一，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紧跟新媒体发展的步伐，主动介入信息传播过程，根据不同媒体传播特点，构建有效的信息传播研判机制。其二，明确媒体研判信息传播的主体责任，扭转娱乐至死的不良倾向。要引导媒体工作者强化行业自律，净化传播媒介，做到一切报刊、书籍、广播影视剧不为错误思潮提供传播空间，文艺当为英雄而歌。其三，加强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广大知识分子研判传播信息的责任意识，引导他们积极传播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积极应对错误思想观点的扩展和落后文化产品的传播。四是要加强网络社会监管，建立网络党史信息监测、研判、处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对网上歪曲党史的谣言迅速予以澄清，及时回击，避免造成负面影响，使真实的党史占据新媒体传播党史信息的主流地位。

三是改进宣教，务实高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人民群众开展党史的宣传教育，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由于英雄的产生与时代较近，对于英雄的宣传重点往往被放在对英雄人物定性、对历史定性上面，而忽略了对英雄壮举和历史细节的详细报道及宣传，留下了英雄人物历史活动的记载不够详细的遗憾，致使后代人对于英雄的认知主要依靠情感传承，在重获感动和敬仰上因细节缺位而显得苍白，情感逐代衰减趋势加重。为此，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上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党史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一要在宣传历史系统性的同时更加重视真实感人的历史细节宣传。通过宣传历史中那些感人的细节，宣传90多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征程，是为了使人们从历史根源上深刻领会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既提高宣传的立意，又更能使群众找到共情点，加深历史的厚重感，加深情感认同，深化群众对历史和祖国的感情，增加宣传的生命力。特别是，决不能为了宣传的需要去忽略历史细节，甚至改变历史细节。二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法增强党史教育效果。要精心组织力量编写高质量的党史教材和读物，赵一曼、江竹筠、刘胡兰、黄继光和邱少云等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早已深入我们民族历史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要创新讲述方式，继续讲好英雄故事，要推陈出新，扩大革命遗址、红色旅游景点、革命博物馆和革命纪念馆的知名度，增强吸引力，推动青少年自觉学习革命英烈的事迹，增强对党的认同感，激发自身的爱国情怀和爱党情怀。三要充分发挥现代网络媒体的作用。要广泛建立图文并茂、声情融会、浏览便捷、更新及时的党史教育专门网站，各主流网站应多设历史类栏目，使其成为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强阵地；党史工作者要敢于和善于在新兴媒体中发声，将自己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中的体会发表出来，从而带动更多的网民学习、了解党的历史，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颠覆别国政权的惯用利器，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颜色革命中屡试不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也必将遭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我们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的要求，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及时揭露和批驳，坚决捍卫自己的民族英雄和历史。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文选》中的城市建设思想

文/ 刘祯贵

2017年2月19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我想通过自己在学习《邓小平文选》过程中，对邓小平城市建设思想的一点体会和思考，以此来怀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城市建设工作。邓小平城市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站在政治的和社会的高度思考城市建设。他提出要重点解决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这也是城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因此，各级城市的领导机关“在今后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始终高度关注城市产业发展问题。研究邓小平关于城市管理的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城市建设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把城市市政建设视为近代工业，打破了把城市市政建设看成是修补城市道路或打扫街道的简单劳动的陈旧观点，对城市市政工作的产业性、技术性、系统性做出了科学的界定；二是把城市市政建设管理（城市建设的主要部分）与工厂、矿山、交通相提并论，城市市政建设在城市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1950年

邓小平观看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规划沙盘模型。来源：《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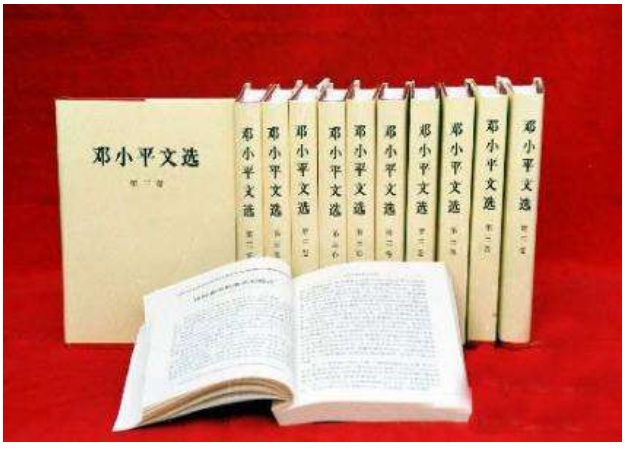
12月21日的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要“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等问题。他明确指出，从事城市工作的同志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城市生产事业，“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根据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的指示精神，邓小平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邓小平始终将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城市建设的最高准则。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坚决批评那种“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的错误行为。邓小平倡导在城市建设中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关心群众的疾苦，注意群众中的难点、热点，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1983年6月18日他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高兴地指出，由于在城市建设中关心群众的利益，“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 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指出，通过“建设居民小区”，“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

邓小平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贯穿城市建设始终。邓小平主张，城市建设应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早在195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一些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法指出：“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国家的现实是：“穷”。因此，“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原则要在城市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得着重注意两点：一是结合实际，搞好城市规划。他认为，“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的，……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城市规划合乎实际，布局合理，城市建设才会健康有序地

发展。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节约耕地。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批评“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没有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简单一点也能指挥生产呢？”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建议发展楼房，说“平房改楼房，能节约耕地。盖什么样的楼房，要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的需要”。1986年8月在视察天津时，他提倡充分利用空地，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邓小平始终强调城市建设应走改革创新之路。早在1980年，面对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形势，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改革家的战略眼光，就如何进行城镇住宅制度改革提出了若干原则，指导了住宅改革的顺利进行。他指出：“关于住宅问题，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农村盖房要有新设计，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发展楼房。”对建筑业如何改革，邓小平1986年8月同天津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者干得好，破格批准他为工程师，应该，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这也叫改革。”邓小平要求在城市建设中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他主张建好城市，必须开放引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在他的倡导下，深圳、珠海、厦门等一大批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认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发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训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影响，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经济应当“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时，着重指出：“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特别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邓小平文选》。

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城市建设思想卓有成效地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城市建设发展面临重大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关键时刻，从《邓小平文选》中认真学习邓小平城市建设理论，不仅是城市建设者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的具体行动，而且也将有利于我国城市建设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城市建设新跨越。

（作者单位：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对绵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 段雯 黄隽颖

绵阳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是一座典型的西部内陆城市。建国以来，既无自然资源优势，又无沿海区位优势的绵阳，依靠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奠定了强大的国防军工科研优势。80年代以来，通过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大力实施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区域发展战略，把一个偏僻的小城建设成了一座初具大城市规模的现代化科学电子城，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创造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

一、绵阳市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的提出与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1983年开始，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对军工企业的民品开发进行了规划。国务院召开专题常务会议研究我国军转民问题，指出军工企业搞民品生产、技术转让，不是为了找饭吃，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不是权宜之际，而是长期方针。

1985年绵阳建市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家各部委陆续把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等军工企业下放给市管理，同时企业内部的体制也进行了适应民品生产的改革，把军工企业推向与地区经济发展结合，推向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为了适应国防建设和军工科研单位发展的需要，国家又对军工企业的地区布局进行了调整，将能搬迁的单位，迁出相对集中的绵阳和江油城区，在完善军工生产和科研任务设施的同时，新建了一批民品科研生产开发基地。上述改革和调整，大大调动了军工科研单位的积极性，有力地加快了军民结合、军地结合的步伐。1988年，绵阳市委根据“军民结合”思想，联系全市军工科研单位的情况，决定把科技兴绵作为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战略，其核心是：大力依靠军民结合，推动科技进步，把军工科研单位的科技优势和潜在的巨大经济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探索出一条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军转民，加快发展地区经济的路子。为了更进一步发挥绵阳军工科研的技术开发潜力和生产潜力，加快军转民步伐，向全国其它同类城市提供示

范，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三线办和三委军转民联合组决定，将绵阳市作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1992年2月，绵阳市委、市政府又作出了《关于大力推进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军转民的政策措施，绵阳军转民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绵阳科技兴绵战略的重点向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转化。一项以“军转民”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科技兴农、科技兴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宏伟系统工程在绵阳全面推进实施。

一是在总体上把国家军转民、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发展区域经济三个基本战略有机联系起来。1988年9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对开发区的位置、规模、发展方向、目标、组织领导和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1990年5月7日，绵阳市人民政府上报四川省人民政府。1992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建立绵阳高新区。12月5日，国家科委发出《关于在绵阳建立绵阳高新区的通知》，批准绵阳高新区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高新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规定的各项政策，审定绵阳高新区规划面积，并对区域范围进行明确。高新区的产业总体规划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其产品，核应用技术及其他产品，新材料技术，高效节能技术及其产品，生物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及其产品，高经济效益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1992年4月至7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绵阳市境内相继建立了绵阳永兴工业开发区、三台工业经济开发区、江油市工业开发区三个省级开发区。1993年8月，省计委批准建立了省级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

二是努力探索“军民结合——军地结合——军地一体化”的路子，构建了“单向辐射型——双向复合型——军地一体型”的三种结合模式。在军工科研单位内部，实行一所（厂）两制、体外分制、经营承包制和股份制等四种经营机制，积极鼓励各军工科研单位改革内部运行机制，以建厂、建线、厂所结合为重点，大力开发民品。90年代以来，绵阳加快了对军工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实行结构大调整、资产大重组、机制大转换，逐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在结构调整方面，军工企业普遍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或集团公司，军、地、民企业紧密结合，互相渗透，形成了绵阳经济的主要支撑体系。在资产重组方面，由于特大型企业长钢公司被兼并，大型军工企业五洲电源厂宣告破产并被长虹公司收购，使军工企业的资产进一步实现了优化组合，使资本经营步入良性循环。在机制转换方面，军工企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机制公司化、劳动用工市场化、福利保障社会化、利益分配多元化的机制大转换，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新机制。充分利用军工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企业技术进步。军工科研单位与地方密切合作，地方企业也逐步转变为依托军工技术，加快自身的技术改造步伐，逐步向军工企业转向民品服务，不仅使新华内燃机公司等一批地方优势企业大发展，而且使涪城区、游仙区的众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成为军工企业的配套产业群，使绵阳的地方工业也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三是把军工科研单位发展民品纳入地方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综合管理。为调动军地双方实施“军转民科技兴市”的积极性，在利益调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军转民的优惠政策。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科技人才开发流动机制，鼓励军工科研单位的离退休、专业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投身地方经济建设，鼓励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保护他们从事技术开发、管理、经营服务所得的合法收入；设立了军转民科技兴市贡献奖，重奖对军转民科技兴市作出贡献的有功人员。

四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税收、土地使用、工商管理等一系列具体化的优惠政策；结合科技体制改革，加快了市级科研院所的结构调整和人员分流步伐，确立

了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发展目标和产业化发展方向，把军转民纳入了区域经济的总体规划。其次，狠抓了交通、通讯、能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第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的合作与交流，为军转民项目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绵阳市加速了科技对外合作步伐，仅1993年绵阳市就兴办三资企业100家，其中相当部分是军转民项目。

二、绵阳市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的推进

从1994年起，绵阳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通过“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一是实现军民结合，促进军工科技进入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狠抓军转民技术商品化；二是实现军地结合，特别是国防科研单位与地方企业的结合，充分利用军工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推动产业规模化；三是实现军地一体化，以军工企业为骨干建立和发展产业集团，促进军转民技术及产品的国际化。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指导原则，通过市场导向，政策推动，把军转民科技兴市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继续大力推进市内各级各类科研院所的机构改革和结构调整，将绵阳市85家技术开发型和科技服务型科研机构全部推向市场，使之与市场经济接轨。大力发展民办科技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迅速形成一批新兴科技产业群。进入90年代后，绵阳充分利用军事科研单位的综合技术优势，不断开拓新产业，逐步形成了以电子工业为龙头的彩电、家电、机械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计算机、磁性材料、传感器、汽车工业零配件、辐射加工系列产品、利尔农药、超微粉体加工、食品机械等“军转民”优势企业，组建了长虹、九州、华丰、东材等一批以国防科研院所、军工骨干企业为龙头的新技术产业集团，逐步形成了规模优势和地域群体开发优势。

二是实施“3115科技工程”。1995年7月，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实施3115科技工程”的决定》。“3115”科技工程是发展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加速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系统工程，即应用30项以上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改造和支撑100个以上具有推动力的项目，逐步形成10大类规模化经营的产品及相应的企业集团、集团，到2000年新增销售收入500亿元。“3115”科技工程主要通过几个路径实现，一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林产品精度加工和综合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效益；二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加快技术开发、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步伐，使大部分产品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三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培育和壮大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初步形成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新材料、高效节能、环境保护、辐照加工、生物工程8大类具有支撑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加速军转民步伐，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广应用辐照、精细化工、气流粉碎、洁净技术，开发50余项民品，逐步实现产品系列化、产业化。五是强化支柱产业，培育和发展企业集团。运用高新技术发展优势产业和骨干项目，培育和发展大公司，壮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规模效益。六是争创名牌，形成独具特色的产品优势。在抓好“长虹”牌电视机、“九洲”牌图文传真机、“五洲”牌电池、“华西”牌医用B超仪、“剑门”牌491Q汽油机、“亚太”牌啤酒等16个现有省以上名牌产品的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名牌发展的条件，鼓励和支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争创更多的新的名牌产品。这一工程的实施，既大力推动了高新术产业的发展，同时又是军转民科教兴市战略的具体化。

三是突出重点项目，促进军转民技术成果产业化。为了推动军转民科技进步，绵阳市每年都选定10-15个新产品、新技术重点项目，组织跨军地、跨院所、跨学科的技术攻关，尽快搞出一批综合性、多层次、系列化的重大技术成果，推动重点产

业的发展。如长虹家电的数字化技术水平提高、东材公司绝缘材料的技改、超微粉体新材料技术、核幅照技术的民用、油脂精细化工技术等，都对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基础，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到1995年，全市形成了几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军转民高新技术项目。如：百事泰油脂化工工程、利尔农药、长虹高清晰度大屏幕彩电、高速图文传真机、程控交换机等，形成绵阳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使“八五”计划期末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46%以上。

三、绵阳市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的纵深推进

1998年3月26日，四川省学习推广绵阳市优化资本结构 推进两个转变试点经验现场会举行。

随着军转民的不断发展，以计划体制管理的国有军工企业在经营体制上的弊端迅速暴露出来，并严重制约着军转民向纵深发展。改革国有经济体制，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愈来愈迫切。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的改革思路，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的根本转变。绵阳的军工企业多，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优势，“两转”改革的重点必然要求放在国有企业上。199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抓住四川区划调整的时机，适时把绵阳作为四川省“两转”改革试点。从此，绵阳市开始了一次以“大解构、大整合，与国际经济惯例接轨”的“两转改革”。绵阳市在“两转”改革中，以长虹公司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国际经济惯例为参照，广泛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按照“国际惯例+国内经验+绵阳实际”的操作思路，对绵阳的经济体制实行结构大调整、资产大重组、机制大转换。经过两年的改革试点，在经济体制方面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解构，并按照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重新整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框架。

一是在结构调整方面，军工企业普遍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或集团公司，由原来的资产单一国有转变成国有资产控股，法人控股和自然人股份并存的新结构。由于实行了股份制，使军工企业同地方企业、民营企业不断进行产业配套的优化组合，军、地、民企业紧密结合，互相渗透，形成了绵阳经济的主要支撑体系，因而使绵阳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由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军工企业普遍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经营格局，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同市外、省外、海外资本相互融合，逐步把自身融进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发展前景更为广阔。这其中要以长虹为代表，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长虹始终坚持科技兴企，把技术创新战略摆在市场需求的第一位。在国际市场方面，与知名企业缔结了技术联盟，营建了海外联合实验室，稳步涉足了高新电子技术的开发与研制领域，把技术创新作为塑造百年长虹的核心原动力。

二是在资产重组方面，由于特大型企业长钢公司被兼并，大型军工企业五洲电源厂宣告破产，1997年，长虹收购绵阳五洲电源公司，后通过收购兼并方式，重组了吉林长虹和江苏长虹电子公司，在全国形成“三大角”布局。收购五洲后，组成长虹电源公司，与日本东芝在电源领域建立了新的战略同盟，并在公司本部成立高能环保电池研究小组。对原五洲电池厂的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重

新在德国购买科研生产设备，对电池厂员工进行技术培训。重组后的长虹电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含金量明显提高，军民用电池很快打入美国市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长虹兼并江苏、吉林两个子公司后，重新安装了高科技生产线体，彩电内部元器件全部采用长虹自己设计生产的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整机技术含量和可靠性提高了90%，年产量增加了100多万台。三个破产企业通过长虹在技术的全盘改造和管理上的科学运作，均从低迷走向兴盛，盘活了国有资产。在改革中，军工企业一般都剥离了原有企业办社会的资产，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经营、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各大型科研院所，通过挖潜，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民品，为自身发展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军工企业同外资联合开发，也是资产重组的重要形式。所有这些，使军工企业的资产产生了很大变化，为今后的资本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在机制转换方面，由于军工企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改革中，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机制公司化、劳动用工市场化、福利保障社会化、利益分配多元化的机制大转换。企业普遍实行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劳动用工双向选择，市场定位，社会福利实行“有保障、基本保障、低保障”等新机制，初步做到了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多能少，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资本营运，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机制。

从1988年到2000年，十二年的探索实践，绵阳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在推进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留下了很多有有益的启示，为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的提出，乃至为成都经济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不断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基础。全市先后在各级干部中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绵阳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大讨论，在广大干部中，采取宣传、培训等多种手段，开展旨在提高全民科技意识的教育，使军转民科技兴市发展地区经济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逐步深入人心，为军转民科技兴市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运行机制，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中心环节。主要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军工科研单位建立适应民品开发、适应市场竞争的内部经营机制，理顺军民生产与开发的关系，实现体制转轨变型；树立金融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实现科工贸一体化；既要立足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开发民品，更要按照市场的需求选择开发研制方向和调整结构；形成规模的民用产品，要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自主经营，独立发展，以加速科技产业化、集团化。

——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重要条件。狠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改善了城市的交通、邮电、通讯、供水、供气、住房、娱乐和体育设施，使绵阳初步成为一座功能较为齐全、经济技术幅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制定了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决定，确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产业发展方向，把军转民纳人了区域经济的总体规划，确立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军工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与企业联合、军民结合、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多层次联合，多形式合作，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重要途径。以项目为龙头，组织跨军工科研单位，跨军地的重大项目开发。通过项目开发，形成多层次的联合和多形式的合作；利用地域内群体研究开发优势和地方的资源优势，逐步形成区域性产业优势。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集团化规模经济，是军转民科技兴市的发展方向。从高科技实力雄厚、综合开发优势强的特点开发，依托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方位开放，开展国际、国内合作，招商引资、引进配套的高新技术和设备，推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集团化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逐步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

（作者单位：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西南科技大学）

抛弃高官厚禄追寻党的足迹

——追忆朱德元帅早期革命活动

文/ 张继禄

朱德

朱德元帅是从四川走出来的红司令，是四川人民的骄傲，也是四川党史中最值得研究的重要党史人物之一，追忆他入党前后的思想进步和精神风貌，追忆他抛弃高官厚禄追寻党的足迹，对于我们开展好今天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很有裨益。

一、找党前的朱德——滇军名将高官厚禄

1．立志“刷新旧国风”。

朱德找党之前，先后从军滇川，一步步从讲武堂学员成长为滇军名将。1907年初，朱德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他受两年前成立的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宣传影响，产生了激进的思想，期待加入同盟会。从成都提前毕业的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当小学体育教员，因强烈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压，愤然辞教从军，他写了一首表达心境立志向的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于是他走出四川仪陇，步行70多天，到了云南昆明，费尽周折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从戎的愿望。

在讲武堂里，他认真学习军事，努力吮吸新知识、吸收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武器，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终于加入了早已期盼的同盟会。他的思想追求进步，行动也很坚决，即按照自己立下的志向和既定目标前进。

2．参加云南起义和两次入川作战屡立战功。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7月，朱德从讲武堂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新编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在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将军的领导和影响下，朱德进步很快。为了与武昌起义相呼应，蔡锷领导云南革命党人举行了九月初九的重九起义，他指定朱德担任第二营左队队官，参加攻打云南总督衙门。在起义斗争中，朱德率队生擒了云南总督李经羲，重九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全省改换共和旗帜。

为了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云南新军编成两个梯团八个营，朱德跟随北上援助四川攻打清军，在叙府（今宜宾市）、自流井（今自贡市）连战皆捷，清军不堪一击，狼狈溃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清帝退位。援川军凯旋昆明后，蔡锷表彰朱德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

著”，授予“援川”、“复兴”两枚勋章。蔡锷认为朱德有政治才能。朱德深得蔡锷信任，被派去临安（今建水）处理驻军与老百姓的冲突，他亦顺利解决问题。随后升任营长。为了援助革命力量，滇军主力出师配合长江作战，留下两个营管理云南全省。朱德在滇南驻军平息土匪的两年中，先后升任团副、团长。

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复辟帝制，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号称率十万大皇军到了四川。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跑到云南、贵州，云南成了革命根据地，四川成了南北抗衡之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率领六个支队北上四川攻打北洋军阀部队。朱德为主力第六支队队长，他奋不顾身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有名的是泸州纳溪棉花坡一战，使前敌总指挥张敬尧落马，直捣吴佩孚司令部，大获全胜。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心惊胆战，被迫与护国军协议停战，随后取消帝制。不久，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之下，一气死去。

朱德在驻防泸州时，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滇军名将。朱德曾自述：“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随后朱德在川南剿匪，深得民心，乡民为他树起两块德政石碑，赞誉他“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功绩。

3．在彷徨中寻求新知和真正的革命道路。

战功赫赫的朱德，声望日高，威震川滇，高官厚禄集于一身，但是却一步步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漩涡，他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叹息“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一时处于厌恶、苦闷、彷徨之中。但是他没有颓废，他在《新青年》、《新潮》、《进化论》、《自由论》等进步书刊中寻求新知，同时深受五四爱国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深刻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他始终想着为国为民，于是冲破军阀混战的樊笼，毅然将功名利禄置之身外，不顾军阀杨森再三挽留并以师长职位相许，毫不动摇地出去寻找真正的革命道路，并很快付诸行动。

二、寻党中的朱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 上北京找党未果仍不放弃。

朱德和孙炳文早已商量到上海、北京去找共产党。他们从1916年的护国战争时就在一起。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曾是北大的学生，与李大钊、陈独秀都相识。朱德受孙炳文影响很大。孙炳文先期到达北京。朱德后来顺着长江东出夔门，先到上海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但没联系上，随后上北京，在那里与阔别年余的孙炳文会合，两人一起考察社会，先后到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看到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他们在北京主要是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可是并没有找到。但是，他们没有泄气，后来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好消息，便一起赶到上海，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2．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被婉拒后也没灰心丧气。

朱德到上海后，和孙炳文、金汉鼎一起先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朱德和金汉鼎一起，组织移驻广西的滇军攻打在广东武装叛乱的军阀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军饷。也是滇军名将的金汉鼎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朱德则对于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的做法丧失了信心，以决心出国学习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朱德出国学习就去美国。朱德不忘初心，执意要去欧洲，“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几天后，朱德和孙炳文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会见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作了自我介绍，讲述革命愿望，提出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请求。陈独秀没想到一个旧军队里的著名将领，从四川跑到上海来要求入党，他告诉朱德，如果要参加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为它献出生命，同时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千辛万苦找党，但却被婉言拒绝，一时感

到难过、绝望、混乱，深感“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终究没有气馁，坚持按既定目标行事，和孙炳文一道去欧洲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

3. 远渡重洋找党终如心愿。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离开上海乘坐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远涉欧洲。经过四十多天航行，终于在法国马赛上岸，匆匆乘火车赶到巴黎。他们在巴黎打听到好消息：中国留学生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其主要组织者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他们感到有了新的希望，立即赶赴柏林，不久即找到了周恩来，得到热情接待。朱德向比自己年龄小一轮的周恩来说明了身份和寻找共产党的经过，恳切提出入党请求，表示一定服从党的安排，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知道朱德和孙炳文的经历后，觉得两位远道而来要求入党的心愿是真诚的，于是同意了两人的入党申请。1922年11月，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秘密的，以由同盟会转入的国民党党员公开身份进行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德入党的愿望，在国内没能实现，在国外终于实现了。他决心实现一定服从党的安排的诺言。

三、入党后的朱德——坚韧不拔忠心为党

1．在国外积极为党开展革命活动。

朱德在柏林苦学德文，研究外国军事，同时学习马列书籍，参加共产党的支部活动，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和组织革命活动、学生会运动，还与德国共产党的书记紧密配合，开展革命运动，办了《政治周报》，并积极写文章，作宣传。他在德国曾两次被捕：一次是1925年为援助保加利亚的革命运动，在开会时被警察抓去，被保释出狱后继续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次是在国内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声援上海的罢工运动，召开了很多工人大会，因参加德共召开的大会，第二次被捕了，护照也被扣了，还是在德国各界声援和德共书记的奔走下才被释放，国际红色救济会帮助办理了护照，购买了船票，才得以从波罗的海到了苏联。

赴苏之前，朱德先给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写信，恳请他们帮助联系赴苏学习军事，“即来莫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到苏后不久，朱德的请求得到中共驻莫支部批准，如愿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理的一个郊外农庄莫洛霍夫卡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术。同训的是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据同训的刘鼎回忆：“教官在讲授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经历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彻。”成了“实际教官。”有一次，苏联教官提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指挥作战，朱德回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朱德通过在德国和苏联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大大深化了过去的军事实践经验。他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自如地运用于军事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游击战争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朱德后来对三年半的国外生活回忆道：“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可见他收获丰硕。

2．回国内秘密为党做军事运动。

192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支持北伐战争。5月18日，朱德毅然决然离开莫斯科，回到苦难深重而又正在奋起的祖国。7月，朱德在上海找到秘密的中共中央军事机关了解情况，而后去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独秀提出两项任务：一是去四川军阀杨森处，杨当时要求合作，要人，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二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已经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虽在请求入党时被婉拒过，但也不计前嫌，选择了立刻去杨森部队作军事运动。理由是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

出国前杨森再三挽留助一臂之力，并以师长一职虚席以待。陈独秀表示同意，并要朱德在沪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

8月中旬，朱德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名义到达四川万县（今万州）杨森处。刚刚被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杨森，脚踏两只船，四面迎合，一面不愿脱离吴佩孚，另一面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并派秘书长赴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调人到万县帮助工作。朱德明确告诉杨森：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委派，于8月下旬来到万县。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个四川人一见如故，共商尽力争取杨森易帜。可是杨森却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尽管如此，朱德回川期间，仍然尽全力做成了几件重要事情：

一是朱德和陈毅千方百计争取到杨森易帜，后来杨森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二是极力鼓动杨森部队扣留在长江横行霸道的两艘英国轮船和攻打英国军舰，但英国军舰向万县城区炮轰两个多小时，酿成死伤军民千人、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朱德、陈毅大力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活动，引起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反英斗争浪潮，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中央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帝国主义"。朱德在一次大会上演讲时说："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

三是朱德利用从武汉带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加紧改造杨森部队，建立军事政治学校培植进步力量。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杨森的猜疑，杨森担心部队被朱德分化瓦解，就让朱德以率领八十余人的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离开他的部队。后来，这批人一半回到了四川，一部分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分随朱德到了南昌。

四是朱德和刘伯承参加了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军委，策划了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虽数月后失败了，但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有益尝试。

3. 在南昌起义前后竭力为党做军事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朱德到南昌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三军是过去的滇军，军长朱培德和师长金汉鼎、王均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军官教育团有一千官兵，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展，担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声望提高，实力扩充，羽翼丰满，公开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中央，实行独裁的面目，他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因此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极力抬高自己自我吹嘘："总理在世，一切由总理作主，现在总理已经过世，中正肩上的担子加重了……"在朱培德、王均、郭沫若讲话之后，朱德发言："旧军阀要打倒，新军阀同样也应打倒……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朱德的发言一针见血，与蒋介石的自我吹嘘针锋相对。

第二天，蒋介石一意孤行，指使新编第一师伙同反动的AB团分子杀害了江西省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激起江西民众的极大愤慨，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各界群众参加追悼陈赞贤的大会和示威游行，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朱德率领军官教育团参加游行，对学员说："反动派已屠杀我们的同志了，我们要准备出击。"之后，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后，局势急速恶化，宁汉合流日显，政治态度微妙的

朱培德下令“礼送共产党出境”。正在赣东率团剿匪的朱德赶回南昌，辞去公安局长，提前毕业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大部回到第三军、第九军，其余分别去赣江流域各县做工人、农民运动），只留下第三营。朱德也被“礼送”离开南昌经九江到达武汉。

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迫使共产党人只能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当时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只有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决定举行南昌暴动，派朱德利用有利条件赶回南昌做准备。

朱德马不停蹄赶回南昌，立刻开始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先绘制了南昌的地图，并加紧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军留驻南昌的几个团长接触。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暴动前敌委员会决定8月1日凌晨2时举行暴动。朱德的任务是设法拖住第三军的两个团长。暴动前夕的晚上，朱德宴请两个团长并陪打牌达两个多小时。正当暴动即将爆发时，两个团长得知贺龙部一个副营长来告密，立即离坐告辞。朱德不便阻拦，紧急赶往贺龙处告诉情况。朱德随后又到第三军第二十团团长家中闲谈，正碰上跑来向团长报告在街上看到叶挺、贺龙部队异常情况的团副，朱德不等他有所表示，就拉着他到街上去走走。暴动提前举行，朱德为南昌起义作准备的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两万多人处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前委决定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立即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军长，并奉命担任南下先遣司令，他立即整编参加起义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吸收一部分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冒着酷暑踏上南下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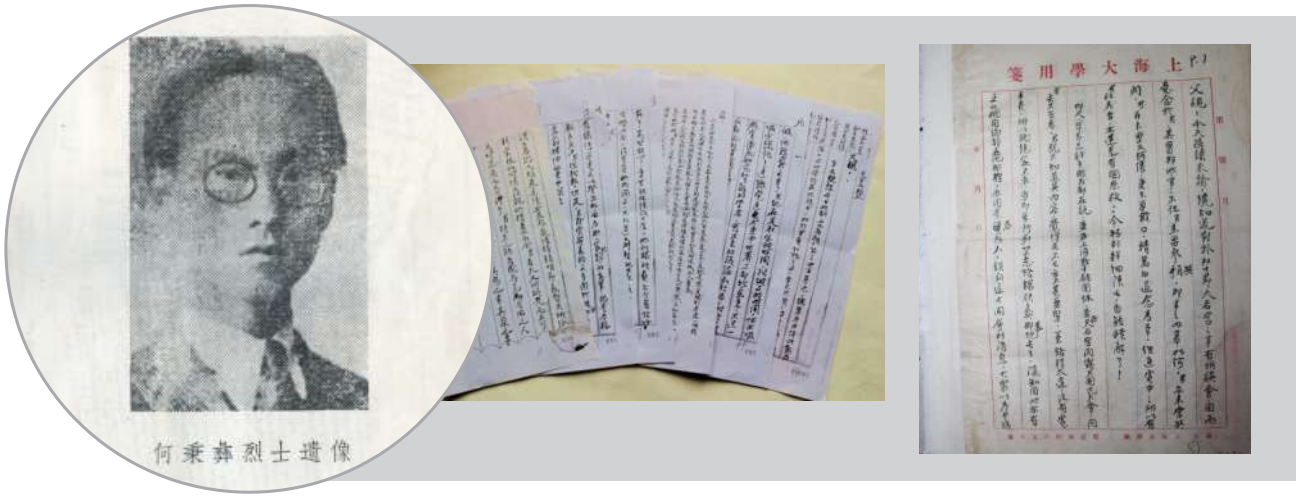
4．在万般危急和艰难困境中保存革命火种。

起义军南下一路征战，到达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前委决定分兵，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四千余人留守三河坝阻击敌军，掩护主力南下。蒋介石嫡系钱大钧率部三个师十个团约两万人马气势汹汹扑来，与朱德部激战三天三夜，形成三面包围圈。在千钧一发之际，朱德认为经过一场恶战的顽强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起义军伤亡也很大，但是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决定立即撤出，星夜兼程去追赶主力。殊不知主力已在潮汕失败，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袭来，许多人情绪低落，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不知所措。起义军余部撤退到广东饶平的茂芝后，与上级失去联系，孤军无援，陷入绝境，部队几乎到了顷刻瓦解的地步。危急时刻，朱德与陈毅和师长周士第等研究后，决定甩掉敌军重兵，部队尽快离开险恶处境，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在会上斩钉切铁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这一席话，句句铿锵有力，激励着大家的心灵，给部队带来了一线希望和生机。

朱德率领余部，在陈毅、王尔琢等的坚决支持下，独撑起义军旗帜，战胜艰难困苦，在敌军重兵追堵之下迂回前行。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和“赣南三整”、湘南暴动，终于把这支在最困难时只剩七八百人、濒临垮掉的队伍发展壮大起来，将一万人马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工农革命军。

朱德一生，无论在顺境中还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始终忠诚于党、坚韧为党，尤其在长征途中的川西北与张国焘的斗争更见党性的坚强，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坚持革命到底。他的坚强党性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共产党人学习、继承和发扬，这在大力惩治党内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今，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何秉彝烈士生前与父母、弟妹、朋友的部分通信遗稿。

何秉彝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给父亲的通信。

封封红色家书 拳拳报国激情

——在家书品读中走进革命烈士何秉彝

文/ 高华 江明

背景资料：何秉彝，号念兹，中共早期党员。1902年生于四川新繁县清流乡黄水泉村(今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11岁随家迁居彭县(今彭州市天彭镇)联升巷。1924年进上海大同中学读书，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同年12月被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不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秘书，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同年底，协助刘华开展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担任这次大示威演讲运动指挥总部联络员的何秉彝英勇就义。何秉彝在生前保持着与亲友通信的习惯，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妇女解放、民族解放等革命思想，通过书信鼓动杨石琴、杨达、何秉钧、何绍文等到上海求学，接受党的教育，走上革命道路。大量的来往信件中，均可看出他对腐败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生活的热爱。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就让我们品读他的其中四封家书，在字里行间感悟这位英雄烈士的心路轨迹和人生历程吧！

第一封家书是1923年4月27日在成都临行前写给父母亲的。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敬禀者：

捧读严谕，反复自思，郑重详察，所训一切，凡抱消极主义图目前之计者，则诚是矣。然恐非为将来永久谋利益、增幸福之计也。试论其故，古语有云:报速者小报，迟者大。以此而抱消极，是报速，非报迟也，实所报甚小，诚非大也。若谨遵严命在此四川半生半死之学校中，随便将此三四年处过，固然于金钱方面少用多矣，家庭乐趣成全完矣，又何尝不尽善尽美哉？诚如是，则对于目前虽觉善美，而推之将来，未必得当，实非谋长久福利之法，做完人事之本旨也。男今年已踰二十，既愧一无所成，尤耻不能自立，然东隅虽已逝，桑榆犹非晚，改业固不能，发奋尚堪造。既已插身学界，投躯工业，虽不敢希其大成，学是专家，抑亦自当为此以立足，由斯而谋生。但四川工校，虽较完善，而学之亦难施诸实用。施教者善良固有，而难堪者则实多。是以学而知之者，尚少有得实学，论

教而后晓者，又安能得其实用乎？学之而不得其用，则金钱虽所费较少，其得欲为此以谋生立足，奈之何其能乎？即日可以执教鞭而暂混干饭，奈学校少而堪教者多， 又安能得其长久乎？既不得长久，其经济乎？其终身乎？其省节乎？故男之所以必欲出外者，诚有鉴于斯。为卜将来计，为谋实用计也，非为求眼前荣，目前誉计也。”

“男将来之能否成为完而有用之人，皆在此一举也！男心决矣！男志定矣！幸其思之！幸其察之！专此特禀。”

从小就是非分明、为人正直的何秉彝在成都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时，目睹了川政的腐败，深感“在此四川半生半死之学校中”，难以“成为完而有用之人”。于是在信中向父母说明了出川求学的原因，并不顾家庭的反对，满怀追求实用本领和真理的欲望，毅然辞别父母和妻儿等亲人奔赴上海，于年底顺利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三年级，接受新文化。

第二封家书是1924年3月18日在上海写给父母亲的。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昨天接得杨达和杨硕彝的信，他们也要出来了，大致于三四月内，即要启程。目的地大致在上海、南京。他们两个亦可钦佩，两个人的家庭都象没有说好，所以他们的信中说，要窃负而逃。但是这几个人之能起这一番大志，相信，差不多一半都是由男一人引导鼓吹之力所致……男同刘矩在沪组织得有个彭县旅沪学会，前天就成立了。公举刘矩为干事，因为上海共有六个人，即是男、刘矩、李民治、陈尧征（住浦东中学）、陈尧弼（住城中附小、两个都是陈厚村的儿子）、章松和女士（住上海大学）六个，最大的目的，是要对于本县有所贡献。一般三皇时代的人的脑筋，要与他改换了，教育上要将不对的地方与他改造过，输送些新文化来。学生界及学校的办理，要指导他们。有志外来的人，加以引导提携，不使去受痛苦，这是对于根本上的事。在上海可以大家联络情感，敦厚乡谊，砥砺学识，所以若在本年夏间或秋间能发动得起三四十元的基本金，定要出版一种刊物，以利实行。”

通过信件可以了解，何秉彝到达上海后，就开始接受新思想，并积极传播新文化，不仅将杨达、杨石琴鼓动到上海，并在他的影响下相继参加革命工作。他还组织成立“彭县旅沪学会”，让大家的思想受到进一步洗礼，逐步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

由于上海大学当时有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党团中央的负责人在任教，何秉彝经常去听邓中夏、瞿秋白的演讲，开始接受党的教育，意识到中国人民必须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有希望。

于是，何秉彝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决意改上上海大学，潜心学习改造社会的学问。他在1924年6月28日回复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道：

“男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男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不是十九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生，以科举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二十世纪的社会谋改造；便要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幸福。”

“所以男决定从事社会学——非从事社会学不可。这一下男的意思，你老人家洞悉了，相信，定能表同情于男的呵！若一定要叫男去读做官找钱的书，习争利求名之学，把男的高洁的身躯葬送在腐臭之窟，男是十二万分的为自已可惜，万难从命的!!!”

“男又何以不到别的地方，一定要住上海呢？因为：北京、天津的坏境太恶劣了，太污秽而汙浊了，各方的情形，已经作了几度的详细调查过，政潮的支配，嚣风的薰染，皆令我痛恨而畏屈，男实在不愿去；即以生活程度而论，也不甚低于上海，况且在那里的学生，必不得已而非正当的消费一一如挟娼赌博等——又多，于人格的丧失甚大。上海是世界文化荟萃之区，并且是东亚第一市场，新潮流的波及，光亮的透射，要算中国土地的先觉，在此地虽然比较多花费几文钱，而相信所得的代价，所享的进益，实在要比在旁的地方所得所享的超出百倍，即是多耗费几文，也大大的值得了!”

“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男相信它是顶

好的学校，信服它的社会科是十分完善的。它的制度、它的组织和它的精神，皆是男所崇拜而尊仰的；男以为它是尽善尽美的，它就是我愿意的学校。它能使男信服，使男崇拜，使男愿意，它就是男的好学校——才算男的好学校！所以男要住它，并不是盲从，并不是受谁的支配、吸引；更不是因男留恋上海而住上海大学的。实在是男个人的意志的裁判和解决与鉴定。再老实说一句：男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更了！男如是行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男了，好像似说：'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着很相适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命之流矢，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此开放……'"

一九二四年八月，秉彝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从此受到瞿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影响，树了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坚定认识。他不仅刻苦研读马列主义，还经常到平民夜校上课、到日纱厂支持工人罢工，并同四川同学刘华、郭伯和等发起组织“四川同学会”和“反川战大同盟”，揭露四川军阀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灾难。由于秉彝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坚毅勇敢，一往直前，深为师友所敬佩。在上海大学就学期间，先后担任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执委，上海学联委员兼秘书，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反对工头打骂女工和无故开除四十名男工举行大罢工。在邓中夏的领导下，秉彝同刘华、郭伯和、杨之华等党团员前往支持。秉彝不畏危险，四处奔走组织各校师生，日夜同工人兄弟一起参加罢工。二月二十日，秉彝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被压迫的劳动者起来啊》评论文章。号召被压迫者起来走俄国的革命道路，推翻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二月十七日，秉彝又在《觉悟》副刊上用“何冰夷”的笔名发表了《官厅与罢工工人》一文，严正地披露了日本内外棉纱厂罢工真象，愤概地揭露了反动政府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经过一系列斗争考验，在“二月罢工”的胜利声中，秉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彭县旅沪学会”部分成员在上海公园合影，左二为何秉彝。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大学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秉彝又在会上宣读了自已写的悼词。他在悼词中不仅提醒大家要警惕敌人阴谋坚持斗争，用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先生，而且沉痛地表示：“我们追悼中山先生，不但以泪，更要以血，不但在目前，必须坚持永久；要振作精神，加倍努力，向一切反动势力进攻，使革命早日成功！”此时的何秉彝，已经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何秉彝在给父亲的第四封信中还写了这样的话语——“看见谕中所述钧雨之争信一事，不觉又把家庭的热度于无形中增高，想于暑假中回来望望家庭景况。但是这不过是这时在纸上所说的空话，心里虽然是想回来望一望，其实事实却使男不想回来的，因为觉得回来也不过只是与大家见见而，大家高兴两天就算了，这就也莫有什么意义了。如果在上海，三四个月之久，学识上要得多少的益，工作上要做多少的事，有此两端，所以又不愿意回来。把这时无味的热情抛弃了，所以回来还是空话，预定在三年毕业后回来也不迟，或是毕业后，因他事羁身，以至迟延到再五六年回来也是不要紧的。才不两天男到商务印书馆去与均雨订得有两种书画，一是儿童画报，一是儿童世界，希望五、六妹无事时好好的教他——均雨——竹君好好的养他，此外还要祷盼那七十五岁的老祖先精神常健，再活一百岁!!!!! 再次则千万盼望父亲善自宝重，母亲好事调养——万福金

安！更其次则以最诚恳的渴望五六妹要跳出那四千年宰割妇女的牢狱来，见见青天白日，更再其次希望钧弟切不要再堕落那迷魂之境，孽海之途。均雨只希望他将来能承继我志与我精神——为解放自己而起来革命！”

从信中可以看出，远在他乡的何秉彝不仅思念父母兄妹，更想念自己的妻儿。虽说“百善孝为先”，但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有着坚定政治信仰、自觉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何秉彝只能不分昼夜地为革命事业奔波忙碌。同时，他还希望自己的儿子均雨能承继他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精神，为解放自己而起来革命！

这一字字、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无不彰显何秉彝舍生忘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让人心生敬仰的家国情怀。就在这封信寄出不久，何秉彝便在上海南京路上英勇牺牲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这天，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担任这次大示威演讲运动指挥总部联络员的何秉彝，往返于南京路新世界至抛球场一带引导和鼓动示威队伍，并处处走在最前头以慷慨激昂的讲演，激起群众阵阵高呼：“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滚出上海去！”愤怒的群众冲向英租界巡捕房门口，英帝国主义巡捕惊恐万状，悍然开枪屠杀，当场打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七人，至次日两天共抢杀学生市民十余人、轻重伤近百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当天，带头冲在最前面的何秉彝不幸中弹，血流殷地，昏迷前仍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次日午后，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反帝爱国战士在仁济医院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是他那忠诚勇敢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将万古长存，世代景崇！他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实现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火红的青春，写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中最绚丽的篇章！

“哀思千缕追先烈，伟业万年仰后生”。在今天的和平时期，我们的青年干部，共青团员，大、中学生，不仅要以何秉彝为楷模，学习他坚定的信仰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与执着，更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关于‘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句话的重要意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德立人，奋发向上，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魄和胸怀，努力担负起历史重任，追逐自己的梦想，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将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以慰先烈在天之灵，以抚英雄殷殷之盼。

彭州园内的秉彝亭现在已成为成都市“党史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广大青年干部、新党员思想教育的“新课堂”。

（作者单位：中共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长征路上彩号连

文/ 许国胜

许金彪（1911——1997），原名许世猛，湖北孝感人。1929年入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由团转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班、排、营长，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团团长，豫鄂挺进纵队副团长，新四军师后勤部部长，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支队长，新四军师参谋处处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坚持了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建国后，任湖北省政府正、副厅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我的父亲许金彪，于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红军，编入1军1师1团重机枪连，随军转战鄂豫皖、川陕甘。他担任重机枪射手数年，战斗中亦数次负伤。1934年10月，父亲又因战斗负重伤住进红军总医院。

1935年1月22日，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3月28日以四个军的兵力强渡嘉陵江，连续攻克九座县城，歼敌万余,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创造了我军向甘南发展的有利条件。徐向前总指挥拟集中兵力打碧口，彻底消灭国民党嫡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率后续部队迟迟不见上来，徐总指挥不断打电报去催，一个月过去了，张国焘仍在磨蹭不见踪影，以致使胡宗南部有了准备，贻误了歼敌的战机。这一个月里，张国焘做什么去了？他命令所有后方部队和军委、川陕省委直属机关做准备，跟随主力部队渡江，竟在红军连获胜利的情况下被张国焘葬送了。破坏了徐总指挥设想的依托川陕向甘南发展的方针，从此，四方面军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又开始了。彼时，父亲正在红军总医院养伤。红军总医院得到上级指示，要有大的行动，要求他们彻底进行轻装。于是伤病号们按要求组成了两个“彩号连”，自己推举负责人。叫干部彩号连的，上至团长下至排长都是干部；叫战士彩号连的，都是排以下士兵。父亲被公推为干部彩号连的指导员，这使他有点意外。战友们正是看到他靠那残剩的一丫脚

筋坚持锻炼走路，才选举他的，实话说，父亲这样的伤势已够“精简对象”。后来，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也果然被“精简”回乡了。

东西轻装后，人员也要求轻装。谁能走谁留下由彩号连连长、指导员定。伤势过重的伤员不能拖部队后腿，只得给点钱寄养在老乡家。可是伤员们都想走，他们知道部队、根据地政府全撤走，谁愿意离开自己的组织呢？从鄂豫皖老区来的夏世厚同志是营级干部，他头部伤势重，只能靠担架上路。彩号连的孙连长征求父亲意见，父亲手一挥：“还是抬上路吧。”他很清楚，寄托在老乡家，红军大部队一撤，四川军阀、财主又会卷土重来实行阶级报复。最后除了四个伤势极重的彩号被迫留下来，其余一百零四个彩号靠担架，靠搀扶，靠木拐杖和骡马，在4月底的一天夜里，上路了。他们哪里会想到前面的苦难历程和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

走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崇山峻岭，越过了陡峭的石崖和下面令人心惊胆裂的幽谷。彩号们第一次来到夹金山。夹金山是连绵大雪山的一部分。海拔几千米高，一年四季风雪肆虐，人顶着风走路晃动如醉汉。高山缺氧，壮汉都会头闷心悸，何况彩号。父亲找到了当地有经验的农民给夏世厚等人抬担架。到陡坡处，换成一个人背，一个人在后面顶着臀部上。其他伤员拄着棍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攀登着。父亲腿脚不便，勤务员小于过来搀扶他，精疲力竭的父亲喘息着不能说话，打手势要他去扶后面走不动的人。愈往上走，空气愈加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谁也不能坐下来休息，坐下来人就完蛋。彩号连的孙连长实在无能为力了，他伤势虽轻但体质孱弱，生命的价值已抵不上倚着崖石喘喘气，他永远地静静地靠坐在崖石上了。又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彩号停止了呼吸，那担架上换了别的战友。

1935年6月，彩号连随总部机关终于在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大家欣喜若狂， 从会师中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得到巨大的鼓舞。

到8月下旬，为了团结张国焘，也为了实施中央“夏洮战役”计划，即依托洮河流域向东进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中央对张国焘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作了一定让步。决定部队分为两路：以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9军、30军、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率领（张国焘任政委），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朝右路靠拢，最后齐头向甘南进军。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彩号连开始第一次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草地在四川道孚。听这名字颇有点诗情画意，然而就是这神秘兮兮的大草地，曾凶残地吞噬了无以计数的红军战士的性命。也不知始于哪一纪哪一代，它成为这样的地貌，淤积发臭的腐草堆上长出年年更新的大片野草，绿草萋萋下覆盖的是深浅不一的沼泽泥潭。无边无际的草地上找不到一颗柔弱的小树，找不到一块石子。飞鸟不过，蚊蚋遍地，气候变化喜怒无常。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时而风狂雨作，冷得战士们牙打嗑、身子起鸡皮疙瘩；时而烈焰腾空，烤得战士们全身冒油；刹时间，又乌云压地，冰雹铺天盖地砸将下来。这时，战士们只能停止前进，用帽子遮头护卫，衣衫单薄的彩号们大多的了疟疾，一路走一路发着寒热。走着走着，坚持不住了，便无声无息地倒下了。其实，草地凶险的迷阵还在后头。开始从大草地的东部边缘穿过，沼泽较浅，过了几天就是走一步就深过膝盖的沼泽。一天大雨滂沱时，前面后面相跟着人的讲话声都听不到，一匹驮着彩号的马一下陷进沼泽，惊慌失措的马拼命挣扎、嘶鸣，彩号滚落下来，掉进淤泥。马挡住了彩号，无法施救，大家全慌了，父亲指挥着大家又打马又拉马，马拔出了腿后大伙才能去救彩号，彩号已陷进马挣扎出的淤泥里，只剩了一个头，他的身子在淤泥里蹬踢，眼睛绝望地望着救援的木棍。谁也无法趋前拉他，既拉不出来自己也要完蛋。淤泥很快吞没了那个彩号。父亲泪水和着雨水，呆若木鸡。一场灭顶之灾只三分钟时间，他听到勤务员小于呜呜的哭声，从恍惚中回过神：“哭个屁，马上的同志都下

来，搀着走，大家跟着我走直线。”父亲拉着马缰绳，在前面艰难地踩路，后边是拄着泥糊糊棍棒的架着、搀着的队伍，这支队伍铁一般沉默。大家都努力不使自己掉队。

终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前方好像有矮矮的暗影，父亲不敢奢想它的意义。终于他们看到了几棵树。又终于，勤务员小于捡到了一块石子。父亲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直到看见更大更多的石头。最后父亲踩上了坚实的土地。

红四方面军走到了阿坝地区。这是1935年8月底，左路军应该进到班佑，朝着右路靠拢了。

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当初不放弃川陕根据地，并实现开创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北上后就有了立脚点，革命的形势会好得多。如果两军会师后齐头并进甘南，北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会更早、范围会更大。两军的实力得以保存，投入到抗日战争中的力量要大得多。甚至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一天会提早实现。两军指战员都是这样热切地企盼的。

9月3日，四方面军来到噶曲河，由于连日下雨，水位上涨，水流湍急。此时，张国焘南下决心已定，他找到了借口：左路军无法过河。他要掉头了。他说中央和一、三军团如果不南下，右路军的4军、31军（原属四方面军）也要南下。

彩号连又随着部队折回草地。这是第二次过草地。正当深秋季节，高原寒风凛冽，战士衣单鞋缺，无食果腹。彩号连的状况更加令人悚然。粮袋已全部空了，他们嚼草根、野菜、煮皮带、牛皮鞋跟。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吃下去后，全身浮肿，腹泻不止。非战斗减员的越来越多，他们拄着棍子，连冻带伤，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张国焘扬言：“要打下成都吃大米。”可是彩号连们现在却在死亡的边界上挣扎，耗尽最后一息，倒毙在茫茫泽国。

草地的夜晚奇寒。那是褴褛的衣衫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的。大家只有挤在一起，背靠着背打盹，熬着漫漫长夜，企望黎明的到来。一个晚上，父亲感觉到背脊上越来越冷，他想站起来动动身子，可是太疲困了。他下意识地忍着，打着沉重的盹。不知怎么，他感到背脊上顶着好沉重的物体，他打了个激灵，转过身子，背靠着他的彩号颓然仰倒。原来他的身子已冷了。父亲用手一抹战友的脸上，感到鼻息全无，仅眼睫湿濡，那是临终前留下的泪。倒下的伤号是个营长，强渡嘉陵江受的伤，临终前，他独自熬着痛苦悄悄离去。父亲把死者的身子摆直，抹下他的眼睑。他没有叫醒战友们，死人的事太平常了。他直起身，思绪麻乱。为什么刚出草地又要返回来？听说上头有争议。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这种无谓的牺牲什么时候结束。彩号连的干部都是革命事业宝贵的财富啊！当时父亲心中的疑虑是破释不开的。

可是鼓舞的动力，希望的目标在哪里？父亲日渐沉默。每次宿营，大伙看到他端着个熏黑的大瓷缸，拖着伤残的脚，带着勤务员小于边喝着野菜羹，边寻找掉在后面的伤员。

二过草地彩号连只剩下五十七人，他们重遇夹金山。上一次翻山，重彩号是雇农民抬担架。这次从北边往南翻，是藏民地区，请不到抬担架的人了。重彩号们全部下来。父亲问：“你们的伤势过不了雪山呀，给点钱寄托在当地吧。”重伤员回答：“两次草地都过来了，离开了部队也是死。让我们过吧。”父亲不再多言，这都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只有带着他们再闯鬼门关。父亲召开了党支部会，根据上次经验，大家议了一下雪山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决定由医院同志加上勤务员、通讯员，每四个同志轮流背一个重彩号爬山。夹金山沿途的景象惨不忍睹，上次通过时倒下的红军遗体、摔死的马匹、丢弃的枪支、炊具等被积雪半掩半露着。这一次爬山更多的红军战士们在体力耗尽时栽倒下来。谁也无法拉。越过山顶，体力损耗小些，伤号们用手撑着地面慢慢往下溜。

南下后，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发起天全、芦山战役。战役后，部队力量损失很大，战斗被迫结束，部队撤出百丈关。红军在天全、芦山、宣兴过冬。红军只控制点线地区，大军云集，与民争粮。藏族上层分子利用这些煽动群众的民族仇恨，政治上对

红军极为不利。至此张国焘“打下成都吃大米”的神话破灭了。事实完全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南下是死路”的预见。

隆冬季节，彩号连随总部机关、医院驻在金川，国民党与藏族上层分子勾结、纠集了两万兵力对我红军形成了围困。部队断了粮，驻地红军只有出去挖野菜，很快野菜也找不到了。只有剥树皮。彩号们饿得有气无力的躺着。

部队因战斗损失需要补充，父亲先被分到总部国家保卫局，不久又任9军供给科长，负责筹粮。多次参加打粮战斗。勤务兵小于随总部机关人员组成筹粮工作队出去打粮，在一个晚上被藏族上层武装包围，敌众我寡，工作队的人全部被杀害，小于也被活活砍死。这个从川北通江来的，十四岁就当了红军的小于，今年也才十七岁呀。父亲心里刀剐一般，他内疚自己没照看好这个孩子。血债要用血来偿，父亲攥紧拳头。

部队决定打出去，冲破封锁，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战斗队。军事部长要父亲带领轻伤员负责守备任务。父亲对部长要求：“战斗队机枪手不多，我去战斗队更好。”

战斗队决定歼灭盘踞在松岗喇嘛庙里的敌军。父亲抚摸着久违了的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群，打得向外冲的敌人鬼嚎般成片的倒下——“小于子，我为你报仇了。”南下以来，憋在父亲心头的那股恶气火山爆发般释出。最后，红军用炸药实行爆破，几千名敌人在熊熊的火海中全部烧死。

消灭了金川的敌人，战斗队出动一千余人用了一星期时间，围了藏族土司7000来头牦牛，十天后，实际赶回来的也有5000余头。

父亲又因伤回到了彩号连。彩号连受优待分到不少牛肉。好久不见荤了，彩号们兴高采烈的打牙祭，大口吃着煮牛肉。没盐也觉得喷香。有的干脆学藏民的样子，偷偷用火烤牛肉干吃，一个个吃得嘴唇乌黑。第二天，有的同志开始感到胸口饱闷，腹中坠胀，夜晚辗转不宁。第三天，这些同志捧腹呻吟不止。呻吟声由小到大，变成声声哀鸣。战士彩号连的情况更严重。医院的医生来了，也束手无策。据说，战斗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有药品、没有灌肠设备。伤号们本来体质差，加上长久饥饿的折磨，胃肠功能太薄弱了。彩号被腹胀折磨得脸孔扭曲，声音渐渐弱下来……彩号连又离去了四位战友。他们被葬在金川一个山坡上。雪花纷纷扬扬，覆盖着一排新坟。仿佛在哀悼这些受尽折磨的红军战士。这一回，父亲和战友们全哭了。

南下碰壁的血的教训，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教育下，以徐向前总指挥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领导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的斗争。主张放弃“川康根据地”计划，回师道孚、炉霍、甘孜，先休整部队。张国焘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同意北上。2月中，主力部队从天全出发，北翻夹金山，经懋功、丹巴翻越大雪山的顶峰党岭山。彩号连也追随着主力部队第三次翻越雪山，红四方面军准备转移到党岭山以西地区筹粮休整。

经过三次雪山、草地，到1936年10月会宁三军大会师时，干部彩号连只剩下38人。

彩号连的使命结束了，父亲的长征还未完结。会师当月，他们奉“中革军委”之命，又随总医院西渡黄河，继续征战。父亲担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领导千余女红军参加战斗，与凶恶的马家军拼战，血洒大西北。后又奉命出任高（台）、抚（彝）县委书记，领导县委一班人打游击，终至弹尽粮绝，多处负伤被俘。最后，经抗敌后援会金素兰小姐联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出面营救，留“八办”工作三月；后返回入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残废医院休养。1938年春，因伤残被集体复员回乡，旋即在家乡宣传抗日，当年即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抗击日伪顽军。

红军时期的艰难经历，磨练出了他们这一代人坚定的革命意志，造就了一大批抗日英雄。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参加中原突围；后加入二野12纵，参加解放战争。并有幸活到新中国成立，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

（作者单位：湖北省人大）

“泸顺起义——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支援北伐战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及军委会于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在四川泸州和顺庆组织领导的四川泸顺起义，至今已90周年。这是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策划的一次大规模军队起义，也是我党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中共重庆地委及军委成员杨闇公、朱德、吴玉章、刘伯承组织领导了这次起义，并由刘伯承任起义总指挥亲自前往泸州城。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众志成城的泸州起义军和广大民众进行了一百六十七天的艰苦守城战。泸顺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起义军的枪声却震撼了四川，影响了全国，鼓舞了人民，并用武装起义反抗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军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2017年，在泸顺起义90周年及建军90周年之际，为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在逆境中奋斗的信念，同时更好发挥红色资源对地方社会经济的作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泸州市委、泸州市人民政府、中共南充市委、南充市人民政府决定联合开展“泸顺起义——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征文活动，届时对征文进行评奖，编辑征文集，适时召开研讨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征文设一等奖2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3000元；三等奖13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若干，文章收入征文集，付给稿酬。

截稿时间：2017年5月31日

投稿邮箱：2380585647@qq.com

联系人: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田时亿

电话:0830-3192639

附参考选题：

1、 泸顺起义的特点分析
2、 泸顺起义的历史背景、长江上游地理因素及发动起义的条件
3、 泸顺起义对北伐战争的支援
4、 泸州及顺庆地方党组织对泸顺起义的支持
5、 从泸顺起义看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6、 为什么说泸顺起义是我党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
7、 论泸顺起义与南昌起义的承前启后的关系
8、 泸州起义与顺庆起义的联系及过程
9、 泸顺起义与我党统一战线
10、 泸顺起义与人民的力量
11、 泸顺起义失败原因探讨
12、 泸顺起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联系
13、 泸顺起义与我党对旧军队的改造
14、 泸顺起义中中共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15、 泸顺起义中杨闇公、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
16、 泸顺起义精神探索
17、 泸顺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8、 泸顺起义对中国军事史的贡献
19、 泸顺起义与泸州南充红色旅游的打造
20、 泸顺起义与泸州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挖掘
21、 泸顺起义与“铁打的泸州”历史渊源探索
22、 泸顺起义蕴含的社会价值对地方经济的作用
23、 泸顺起义对四川革命力量格局的影响

» 着力扶“志”与扶“智” 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刘晓晨主任调研广安区悦来镇方寨村脱贫攻坚工作

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1月11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一行冒雨前往广安市广安区悦来镇方寨村开展春节前“走基层、送温暖”活动并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陪同调研。

在方寨村，刘晓晨一行先后对“两委会”活动室、村组道路、水利设施、文化设施、环境卫生、产业发展等进行了实地查看，听取村两委会及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汇报。在2组、6组、7组部分贫困户和老党员家里，刘晓晨与他们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健康、收入情况，还为他们送上大衣、慰问金以及新春祝福。得知大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生活质量得以不断改善和提高，今年能够实现脱贫摘帽的情况后，她高兴地鼓励大家发奋图强，继续朝着小康目标迈进。

» 省委党史研究室到过街楼社区开展“走基层送温暖”活动

1月23日下午，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仁、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带领宣教处、机关党委党支部党员，前往青羊区少城街道过街楼社区开展“走基层、送温暖”活动。在社区办公楼，李仁、郭生春一行参观了社区阵地建设、文化室、安康养老中心等活动设施，慰问看望了社区全体职工，与社区书记、职工、党员代表、群众代表进行了温馨的谈心谈话，详细了解社区当前各项工作。随后，李仁、郭生春一行分别入户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与老党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健康、收入情况，为他们送上大米、菜油、牛奶等生活必需品，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祝福，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合家欢乐。

» 达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莫怀学到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指导工作

1月13日，达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莫怀学到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指导工作，看望慰问干部职工。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主吉平汇报了全市党史工作情况以及本室领导班子、队伍建设、机构编制、人员配制、工作方向和工作困难等情况。莫怀学部长对近年来党史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对新形势下党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他强调，新时期党史工作者要保持“研、专、迷”的工作态度，要沉得下去、钻得进去、跳得出来，要充分挖掘达州宝贵的红色资源，做好党史编研基础工作，拓展党史工作新领域，抓好党史的宣传教育，重点围绕从严治党来深化资政研究，切实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去。

» 广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立云出席《市委文献资料选编》征编工作会

1月18日，广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立云出席《中国共产党广安市委员会文献资料选编（2013—2016）》征编工作会，并

在讲话中就征编工作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要深化认识。二要抓好落实。三要强化保障。

会议由广安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唐鹤松主持，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侯立新围绕《市委文献资料选编（2013—2016）》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市级相关部门分别作表态发言。

»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俊辉看望慰问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干部职工

1月26日，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俊辉来到行政中心办公大楼，看望慰问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干部职工，送上了新春佳节的祝福和问候。杨俊辉部长深入到各科和编辑室，与干部职工一一握手，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了党史基本著作、志书、年鉴等编修情况，充分肯定了一年来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所做出的成绩。他指出，党史方志工作者为党为国修史存史，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再创佳绩。

»《中国共产党达州历史》（第二卷）、《中共达州市委执政实录》（2015年卷）同时出版发行

为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党史工作“一突出，两跟进”要求，全面、客观、准确记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达州的执政活动，即时跟进地方党委中心工作，由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达州历史》（第二卷）和《中共达州市委执政实录》（2015年卷）两本党史著作，近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 绵阳市盐亭县召开《中国共产党盐亭执政实录（2016卷）》编纂动员会

2月17日，盐亭县召开《中国共产党盐亭执政实录（2016卷）》编纂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议。县政府办纪检组长程磊同志主持会议，全县36个乡镇分管党史县志工作领导和编纂人员参会。会上，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陶文元传达了省市《乡镇简志》《名镇志》编纂工作会议精神并作动员讲话，对我县《中国共产党盐亭执政实录（2016卷）》《乡镇简志》《名镇志》编纂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党史县志办公室地方志股干部就编纂工作进行业务辅导。

»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2017年新春下乡送温暖行动”走进宣汉县三墩乡大窝村

经中共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达州市直机关工委批准同意，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单位四川根据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腾珑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达州市干部驻村办，在2017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联合举办“弘扬红军精神，助力精准脱贫——2017年新春下乡送温暖行动”。1月10日，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走进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大窝村，理事单位四川腾珑牧业集团为该村15户红属、烈属和特困户送上了自己养殖的生态猪肉，四川省根据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送上的是自产的长征酒，爱心企业达州市凯翔车业观致4S店为贫困群众送上食用油和大米，达州市通川区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大家带来了暖暖的毛衣，四川省宝文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献上了新春挂历。活动当天，身着红军服的红色志愿者为村民免费理发、做义工服务，还开展了文化下乡活动，为村民们带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等经典歌舞，以及《铁血大巴山》的诗歌朗诵。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
省委决定刘晓晨同志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2017年1月6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室干部职工大会宣布省委决定。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晓晨在会上作表态讲话。

2017年1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刘晓晨同志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蒋天宝、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杨立出席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与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大会。

在会上，杨立处长宣读了省委对刘晓晨同志的任命决定。蒋天宝副部长代表省委、省委组织部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对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领导的任命，是省委统筹省级机关领导班子建设全局，结合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建设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省委对省委党史研究室班子队伍建设的高度关心，体现了省委对全省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家要坚决拥护和自觉执行省委的决定。蒋部长在讲话中对刘晓晨同志的主要情况作了介绍，并对省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干部职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党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二是要崇廉尚实、凝心聚力，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三是要担当担责、主动作为，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党史工作强省。希望省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同仁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悉心指导下，在以刘晓晨同志为班长的领导班子直接带领下，同心同力，拼搏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全省党史工作整体跃升，为推进四川“两个跨越”、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晓晨主任在表态讲话中表示，省委的决定是组织的关心、信任和培养，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衷心感谢；天宝部长代表省委、省委组织部作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省委党史研究室近年来的工作，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深切关怀，也是殷切希望，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刘晓晨主任进一步表示，接过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今后工作中，要带头做到政治坚定、勤学精业、精诚团结、勇于担当、务实清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刘晓晨主任表示，有省委的坚强领导、有省委组织部的关心关怀、有历届领导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精诚团结的领导班子、有肯干实干的全体干部职工，我们一定能够按照省委提出建设党史工作强省目标，不断开创四川党史工作新局面。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仁代表室领导班子原有成员及全体干部职工作了表态讲话，他指出，这次省委任命晓晨同志担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是我们省委党史研究室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省委对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亲切关怀。全室干部职工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定上来，紧密团结在以晓晨同志为主任的新班子周围，坚决支持晓晨同志的工作，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迈上新台阶，为把四川建设成为党史工作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向省委交一份满意答卷。

会后，刘晓晨主任在李仁副主任、江红英副主任和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的陪同下，到各处室与干部职工们亲切见面。

（宣传教育处）

资阳市安岳县燕桥村新貌